

红旗

HONGQI

苏共新领导奉行苏美合作路线的供状

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的时代开始了

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评吴晗同志的资产阶级历史观

一九六六年 2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六年第二期 ★

目 录

苏共新领导奉行苏美合作路线的

供状本刊评论员 (1)

苏共新领导鼓吹苏美合作的两本书 (10)

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的时代开始了本刊评论员 (16)

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运用《实践论》总结民间测天经验段春作 (20)

《矛盾论》的思想进了水泥窑刘培顺 (28)

一万公里和一公里赵维会 (33)

“老规矩”是怎样一破再破的魏勤生 (34)

为人民站柜台，从实践中学本领杨瑾瑜 (36)

评吴晗同志的资产阶级历史观马 岩 (42)

一家贫农

——访问越南通讯：《人民战争花最红》之二魏 巍 (52)

☆ 二月十一日出版 ☆



苏共新领导奉行 苏美合作路线的供状

本刊评论员

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灵魂。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极力显示他们与赫鲁晓夫有所不同，装起一副反美的样子，企图掩盖他们继续推行这条路线的实质。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他们在苏美合作方面，比赫鲁晓夫做得更加彻底，走得更远了。

苏共新领导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揭露他们的真面目，感到很恼火。他们破口大骂，说我们揭露他们的文章充满着“毫无根据的诽谤性和挑衅性的捏造”^①。

咒骂和诡辩是改变不了事实的。苏共新领导的大量言论和实际行动，他们的报刊文章，每天都在揭露他们自己。苏共新领导在一九六五年出版的一批宣扬苏美合作的书籍，也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这一批书中，《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和《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具有代表性的两本。

这两本书的主要论点是些什么呢？

《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一书，是一九六五年由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这本书虽然不能不谈到美国对外侵略的某些事实，说了一些指责美国侵略活动的话，但是它力图证明，这些坏事都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干的，而同样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美帝国主义头子却不属于反动派之列，这就是说，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可以改变的。谴责美帝国主义，不过是表面文章，掩盖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才是全书的实质。

这本书把美国统治集团分为“冷静的、明智的”和“好战的、侵略的”两个派别。书中说，

^① 苏联《真理报》1965年11月16日文章。



“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中冒险主义的和侵略的趋势同冷静的和明智的趋势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正日益强烈地席卷着美国的真正统治者队伍——国内最大垄断组织”。书中还说，“美国社会生活中两种对外政策趋向，即两个集团——极端反动的疯狂侵略派和倾向于明智地估计现有力量对比、倾向于和平共处的温和冷静派之间的斗争已达极点。”

谁是这种“倾向于和平共处的温和冷静派”呢？照这本书的说法，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头子，战后历届美国总统。书中说，艾森豪威尔“代表比较温和的、无意实行自己的冒险主张和冒大战危险的人士”；肯尼迪是“受人民欢迎的”总统，“眼界宽阔，冷静地对待国际生活的迫切问题”，“了解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约翰逊是个“非常慎重而温和的政治家”，“不倾向于政治冒险”，他“得到人民的绝对委任，去实现旨在巩固和平、消除‘冷战’、谋求苏美接近的政策”。

这些战争罪魁怎么会忽然变成了和平人士呢？这些人民公敌怎么会忽然变成了受人民欢迎的总统呢？书中这样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涂脂抹粉，无非是为了推销苏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货色。书中说，“美国统治阶级或多或少地开始理解到，当前世界阶级力量的具有决定性的斗争场所是和平经济竞赛”。在“核世纪”，“只有疯人，只有自杀者，才能把战争作为自己政策的工具”，“美国政府在许多情况下都表示出了妥协的意愿”。书中说，只要苏美“和平共处”，“那么国际舞台上两种社会经济体系的竞赛和两个主要敌手的意识形态斗争，就将限定在没有流血冲突与战争的、广泛的经济、外交、科学和文化的竞赛与合作的范围之内”。

这本书宣称，“苏美关系，世界两大最强国家的关系，是世界政治的轴心，是国际和平的主要基础”。书中引用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的话，鼓吹“两大国——苏联和美国——对世界命运，对人类命运的特殊责任”。书中说，苏联“致力于同美国的和平与合作，认为苏美关系是当代世界政治中的首要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关键”。

那么，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轰炸社会主义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屠杀越南人民，会不会妨碍苏美关系呢？照这本书的说法，是不会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苏美之间也没有任何冲突。这本书强调“苏美关系非常重要的特点”，是所谓“两国民族利益的共同性”。书中说，“除开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美国参加对苏俄的军事干涉这个污点之外，俄美和苏美关系没有为任何军事冲突和战争的乌云所笼罩。”“就是在现在，两国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领土的、经济的争执和冲突，它们的民族利益，无论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或者在任何局部地区的范围内，都没有互相冲突”。

《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一书，是一九六五年由苏联科学院世界经



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批准出版的。这本书论述了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美关系史。它不能不提到美国侵略和敌视苏联的历史事实，但是，它的落脚点仍然是苏美合作，它强调“苏联旨在同美国建立全面合作的政策是不变的”。

为了替苏共新领导的苏美“全面合作”政策辩护，这本书不惜歪曲历史，硬说“苏维埃国家从其成立最初之日起就始终一贯地奉行同美国全面合作的方针”，“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一年苏美关系的历史令人信服地表明，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友好合作，既符合苏联和美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其他各国人民的利益”。书中还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的苏美合作，为永远结束美国统治集团战前的不现实的和缺乏远见的对苏政策，为发展战后时期卓有成效的苏美关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为了给苏美合作的政策制造根据，这本书极力渲染当今的美国统治集团是爱好和平的。书中说，现在“美国有势力集团中比较有远见和头脑清醒的代表人物，都主张实行比较现实的对外政策”，“他们清楚地理解到，在现时的国际局势中，美国和苏联之间唯一可以接受的合作基础是和平共处及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和其他方面进行竞赛”。

这本书强调，“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认为苏美关系的正常化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书中搬出了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对赫鲁晓夫报告的决议中的这一论点：“改善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对于促进国际局势的健康发展，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苏联和美国是两个对普遍和平的命运负有特殊责任的国家。”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本书的腔调，同赫鲁晓夫的言论是一模一样的。赫鲁晓夫说过，“整个国际局势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美国 and 苏联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①，“历史把对世界命运的巨大责任加于我们两国人民身上”^②，苏美两国的“利益在任何地方都不发生直接冲突，无论在领土问题上还是在经济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共处”^③。赫鲁晓夫的徒子徒孙，不过是照着葫芦画瓢而已。

很显然，这些书，完全是根据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纲领的修正主义路线写成的。书中的话，就是苏共新领导所要说的话。这些书的出版，又一次证明了苏共新领导奉行着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证明了他们的苏美合作的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他们追求苏美合作，不是个别的言行，而是根本的路线。这些书，

① 赫鲁晓夫 1961 年 9 月 8 日在苏联、印度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②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1961 年 12 月 30 日给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新年贺电。

③ 赫鲁晓夫 1962 年 4 月 20 日同美国出版商考耳斯的谈话。



就是苏共新领导奉行苏美合作路线的供状。

乍看起来，这两本书用了不少篇幅叙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骂了美国的反动派。但是，只要仔细看一看，就不难发现，书中只是泛泛地谴责美帝国主义，而对美国统治集团的当权派，却极尽其吹捧之能事。尽管书中表示苏联反对美国的侵略活动，然而说来说去，总是乞求苏美合作。这种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无非是为了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为美帝国主义更好地效劳而已。

这两本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它们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它们揭穿了苏共新领导现在玩弄的种种欺骗手腕。

苏共新领导说，他们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事实怎么样呢？正是在美帝国主义疯狂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一九六五年，他们出版了这样一批宣扬苏美合作的书，宣称“苏联旨在同美国建立全面合作的政策是不变的”。苏共领导人自己也多次出马，亲口说明了这一点。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一九六五年五月说，“我们主张发展和改善同美国的关系”^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同《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的谈话中说，苏美两国“从长远前景的观点来看，主要的应该是，组织一切力量来抵制战争”，苏美两国应该动员自己的力量，“把这些力量用于发展合作和寻求各种争端的解决办法”。^② 这那里是什么反对美帝国主义呢？这些话难道不都是苏共新领导坚持苏美合作的自供吗？

苏共新领导装模作样地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人们可以看看，他们在自己出版的书中究竟是想证明什么。他们同赫鲁晓夫一样，把美国统治集团的当权派说成是“明智派”，说这些人“愿意和平共处”，“认识‘核世纪’的现实性”，懂得“只有自杀者，才能把战争作为自己政策的工具”。这岂不是等于说，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并不是奉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美帝国主义不再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了吗？这些论点不是明目张胆地宣传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了吗？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内部尽管有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之间尽管有剧烈的利害冲突，他们在奴役国内外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统统都是反动派。美国统治集团在反革命的方法上虽然有不同的主张，经常吵吵嚷嚷，这个说这种反革命方法好，那个说那种反革命方法好，但是，他们在维护国内反动统治和侵略世界各国的根本政策上，是完全一致的。世界上绝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明智”。如果说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什么“明智”的

① 勃列日涅夫 1965 年 5 月 8 日在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② 柯西金 1965 年 12 月 6 日同美国记者赖斯顿的谈话。



话，那不过是维护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明智”，对内压迫本国人民、对外掠夺世界人民的“明智”，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明智”罢了。苏共新领导热衷于在美国统治集团中划分什么“明智派”和“反动派”，他们的实际用意，除了替美帝国主义打掩护，帮助美帝国主义者麻痹世界人民，又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苏共新领导有时也骂几句约翰逊。这不过是一种烟幕。这些书表明，他们同赫鲁晓夫一样，把美国总统说成是和平的天使，美国人民的绝对代表。他们这样做，道理也很简单。这是因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总是把他们的赌注压在美帝国主义头子的身上，不论谁当了美国总统，他们都要极力地加以美化。

事实一次又一次地打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耳光。当代美国的总统，那一个不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工具呢？约翰逊自己并不掩饰这一点。他在美国商会一九六四年年会上对美国垄断资本家说，“你们都是本政府的股东”，“我在进行你们雇用我来做的工作”。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他们独霸世界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是一脉相承的，而且越来越发展，越来越疯狂。“约翰逊主义”就是当代的法西斯主义。它赤裸裸地宣布，要使用武力来干涉世界上一切地方的事情，推翻世界上一切美国所不喜欢的政府。约翰逊政府正在战争冒险的道路上逐步升级。“约翰逊主义”是美帝国主义更加好战、更加冒险的表现。苏共新领导不顾一切地给美帝国主义头子脸上贴金，只能给他们自己出丑。

苏共新领导说，他们是“恪守列宁遗训”的。他们究竟是怎样对待列宁的呢？他们在这些书中，竟然把列宁说成是苏美“全面合作”政策的创始人，把苏美关系的历史描绘成一部实行“全面合作”的历史。这不是对列宁的背叛，对历史的歪曲，又是什么呢？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积极参加了武装干涉新生苏维埃国家的帝国主义十字军。在武装干涉失败以后，美帝国主义继续用“饥饿的绳索”，企图阻挡苏联的发展。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时期，苏美关系充满着尖锐的复杂的斗争，这是国际无产阶级同国际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剧烈斗争的表现。苏共新领导要在苏美关系的历史中抹去阶级斗争的内容，这是篡改历史，这是污辱苏联人民。

列宁在世的时候就指出，美帝国主义是“消灭俄国自由的刽子手和宪兵”^①，扮演了“世界革命的绞杀者和刽子手的角色”^②。列宁号召，“要毫不调和地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这个

① 《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报告》。《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第190页。

② 《全俄工、农、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8卷，第141页。



最后参加资本家为瓜分利润而进行的世界大屠杀的最新最强的帝国主义”^①。列宁的这些话，今天我们读起来，还是那么清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打出列宁的旗帜来掩护自己，但是，列宁的话恰恰最有力地揭穿了他们的面目。

苏共新领导说，他们是忠实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但是这些书表明，他们是在说谎。宣言和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而这些书却大谈其苏美友谊。宣言和声明指出，全世界人民必须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这些书却极力鼓吹苏美合作。他们所忠实的，还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总路线。他们抬出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来，不过是采取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老手法，表面上承认它，实际上阉割它的革命原则，用漂亮的词句来掩盖他们反对革命的本质。

苏共新领导说，他们是承认各国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的。但是在这些书里，他们毫不掩饰地宣扬强权政治，活现出一副大国沙文主义的神气。在他们眼里，世界的命运是要由苏美两国的统治者来决定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都应当围绕着苏美轴心打转，全世界人民的生存都只能仰赖于苏美两国统治集团的恩赐。这难道不是证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梦寐以求的，就是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吗？

苏共新领导假惺惺地说，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革命人民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并且一再表白他们是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各国人民革命的。但是，他们在这些书中大事宣传的，却是苏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这样两种“共同利益”，是截然相反的，是水火不相容的，怎么能够扯到一块呢？美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的公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心要跟美帝国主义者讲什么“共同利益”，这只能说明他们把屁股坐到美帝国主义那一边去了，他们把自己置于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相对立的地位。

按道理说，社会主义的苏联同帝国主义的美国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就必然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任何局部地区的范围内，同美帝国主义发生尖锐的斗争。现在，苏共新领导却强调，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无论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或者在任何局部地区的范围内，都没有互相冲突”。这只能表明，在他们的心目中，世界范围内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早就不存在了，支持被

^① 《给美国工人的信》。《列宁全集》第28卷，第43页。



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义务早就不存在了。他们已经堕落到资产阶级民族利己主义的泥坑里，再没有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气味了。

苏共新领导强调苏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这完全是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肯尼迪早就要求苏共领导“只照管它的本国利益”，同美国“达成能保障我们两大国的利益”的协议^①。从赫鲁晓夫到苏共新领导，都积极地响应帝国主义的号召。他们的确同帝国主义者有着共同利益，这就是他们所代表的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共同利益，这就是苏美合伙反对世界革命的共同利益。

苏共新领导在这些书里所阐述的苏美合作的政策思想，早已付诸行动。最近一个时期，他们为了追求同美国的“共同利益”，大大加紧了同帝国主义的勾结。

苏美印三家在新德里会见，公开加强反华联合阵线。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在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以后，毫不掩饰他的满意心情。汉弗莱在电视讲话中说，这次会谈是“坦率的、直言不讳的”，他在会谈中说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并且“也从柯西金先生那里得到了响应”。汉弗莱说，“苏联正试图在共产党中国周围建立一道遏制的墙”，“苏联政府今天对于自己在全世界各地与共产党中国之间的关系的关切，比对于美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可能做的任何事情更关切得多”。汉弗莱认为，“展望今后几年”，美国同苏联的“接触将会扩大，关系能够改善而且应该改善”。^②

汉弗莱的谈话表明，苏美之间的合作达到了何等亲密的程度。汉弗莱对于苏共新领导的政策这样有把握，敢于公开这样讲，是因为他们互相交了底。苏共新领导的政策，就是要联合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一个反对中国的反革命包围圈。苏共新领导的这种政策，完全符合美帝国主义的心意。美帝国主义者很自然地要拍手欢迎，加以支持和鼓励。这就是苏美新德里会谈的实质。这是苏共新领导最突出的叛变行动。如果事情不是这样，苏共新领导为什么没有对汉弗莱的讲话辟谣呢？

在越南问题上，苏美勾结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正当美国“停止轰炸”，掀起一阵“和谈”喧嚣的时候，谢列平仆仆风尘访问河内，紧密配合美国的“和谈”阴谋。苏共新领导还同美国在欧洲局势问题上达成了默契，使美国能够从欧洲抽调越来越多的兵力到越南来扩大战争。苏共新领导现在讲一些支持越南的话，给越南一些援助，无非是企图在越南问题上增加自己的发言权，企图挑拨中越关系，企图帮助美国实现“和谈”阴谋。归根到底，他们是要在越南

^① 肯尼迪 1961 年 11 月 25 日对苏联《消息报》总编辑阿·伊·阿朱别伊的谈话。

^② 汉弗莱 1966 年 1 月 16 日对美国记者的电视谈话。



问题上为美帝国主义找出路，让美帝国主义永远霸占越南南方，同美帝国主义做成一笔政治交易。

苏共新领导这种立场，美帝国主义者很清楚。美国总统特别助理麦·邦迪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很清楚：苏联政府希望能够取得和平解决”^①。美国报纸说，“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苏联和美国事实上是在并行的轨道上向着它们共同持有的某种目标前进”^②。美国报纸还说，如果苏联“最终将帮助取得一种可以为人们所接受的越南解决办法的话”，美国将可以“从一种危急的局面中脱出身来”。“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目前苏美关系的根本之点在于，这种关系必须是一种默契的关系”，“美苏之间的矛盾必须继续是公开的，它们之间的一致却必须继续是不讲明的”，“它们既是公开的敌人而同时又是暗中的盟友”。^③

苏共新领导的苏美合作路线，一个时期以来又扩展到了苏日合作方面。美帝国主义加紧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作为自己在亚洲的主要战争帮凶，指使日本反动派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签订了“日韩条约”，实际上拼凑了东北亚军事同盟。对于美帝国主义这样一种针对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严重战争部署，苏共新领导不但不予谴责，反而向日本反动派大献殷勤，加紧拉拢。苏日高级官员频繁地进行相互访问。日本外务相最近应邀访问了苏联。苏共新领导实际上承认了日美军事联盟，并且要搭上自己的一股，搞一个苏美日联盟，来反对中国、朝鲜和亚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发生了所有这样一些事情以后，苏共新领导还说，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要把它们之间的分歧放在一边，在反帝斗争中实行“联合行动”，这怎么能够取信于人呢？他们究竟是联合谁，反对谁，难道还不清楚吗？

苏共新领导是同美帝国主义者联合行动，是同日本反动派联合行动，是同印度反动派联合行动，是同美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联合行动。既然他们这样热中于反革命的联合行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怎么能够同他们联合行动呢？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之间，真革命派同假革命派之间，最大的根本分歧，就是反对还是联合美帝国主义的分歧。这样重大的分歧怎么能够放在一边呢？

只要苏共新领导不放弃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不改变苏美合作路线，不取消苏美印日

① 麦·邦迪 1966 年 1 月 16 日对美国记者的电视谈话。

②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6 年 1 月 13 日评论。

③ 《纽约时报》1966 年 1 月 17 日报道。



联盟，我们就决不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美帝国主义拴在一起。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要反对美帝国主义，就势必要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只有坚决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划清界限，只有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才能顺利地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散布崇美思想，我们就必须树立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思想，认清帝国主义的腐朽本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散布媚美思想，我们就必须树立仇视帝国主义的思想，认清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散布恐美思想，我们就必须树立藐视帝国主义的思想，如实地把它当做一只纸老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散布联美思想，我们就必须树立打倒帝国主义的思想，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怎样认识和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世界人民进行反美革命斗争的强大武器。毛泽东同志号召，依靠工人、农民，团结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以及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都要利用，一切有利于反美斗争的积极因素都要调动起来。毛泽东同志这个伟大的战略思想，指出了打败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它的正确性已经为战后时期国际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所证明。这个战略思想，不但武装了中国人民，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它是帝国主义最害怕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最头痛的，全世界人民最欢迎的。

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只是一种狂妄的梦想。世界的真正主人是各国人民。任何国家的统治集团，无论是帝国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要想骑在各国人民的头上，统治全世界，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在世界范围内，一个新的、伟大的反美革命风暴不久就将来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反人民的政策，只能是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反对人民的人必定被人民所打倒，违背历史潮流的人必定被历史潮流所埋葬。无论要经历什么样的斗争和曲折，世界只有一个前途，那就是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一定要灭亡，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一定会胜利。



苏共新领导鼓吹苏美合作的两本书

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出版了一大批宣扬苏美合作的书籍。《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和《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本。

这些书，以论述美国对外政策和苏美关系史为名，极力掩盖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质，把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的美国的关系史说成是一部“全面合作”的历史，鼓吹苏美联盟主宰世界。这些书肆意歪曲现实，篡改历史，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苏美“全面合作”的路线辩护。

这些书，虽然也用了不少篇幅，谈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表示谴责美帝国主义，但是说来说去，结论总是：美国统治集团的当权派是“明智派”，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可以改变的，苏美“全面合作”的路线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揭穿了苏共新领导装出一副反美姿态，不过是欺瞒世界人民的障眼手法而已。

苏共新领导出版的这些书籍，在散布崇美、媚美、恐美、联美的谬论方面，比起赫鲁晓夫时期出版的同类主题的书籍来，不仅一脉相承，而且更加露骨，更加彻底，更加肉麻。贯穿着这些书的一条黑线，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总路线。

《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和《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这两本书，已经由世界知识出版社翻译出版，在全国发行。现在，把这两本书的主要论点介绍如下：

《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

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编

И·列明主编

苏联“科学”出版社一九六五年出版

宣扬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已经改变

这本书说，“认识‘核世纪’的现实性——这是有利于维护和平和改善苏美关系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苏联拥有的“绝对武器”，“迫使美国领导人大大改变自己的思想方式”，美国



认识到，“火箭——核战争对美国来说是自杀，因此必须寻求战争以外的某种出路”。书中说，“只有疯人，只有自杀者，才能把战争作为自己政策的工具。和平共处政策成了客观的必要性，历史的必然性”。“美国政府在许多情况下都表示出了妥协的意愿”。

书中说，“美国国际政策的主要动力”、“决定着美国当前行动方针的主要因素”，是“两种制度的斗争和竞赛”。“美国统治阶级或多或少地开始理解到，当前世界阶级力量的具有决定性的斗争场所是和平经济竞赛。资本主义的命运正是在这里来决定”。

把美国统治集团分为“明智的”和“好战的”两派

这本书强调“不能抽象地看待帝国主义本性”，认为“在美国垄断集团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情况”。书中把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分为“冷静的、明智的”和“好战的、侵略的”两派，说“我们不能把整个美国社会都说成是一丘之貉，不能不看到美国社会内部的斗争，即统治阵营中两种趋势——好战的、侵略性的趋势同温和的、清醒的趋势之间的斗争”。书中说，“在美国统治集团、大生意人、国会和国家机构里都存在着稳健派和侵略派的斗争”。

这本书认为，“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中冒险主义的和侵略的趋势同冷静的和明智的趋势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正日益强烈地席卷着美国的真正统治者队伍——国内最大垄断组织”。“美国社会生活中两种对外政策趋向，即两个集团——极端反动的疯狂侵略派和倾向于明智地估计现有力量对比、倾向于和平共处的温和冷静派之间的斗争已达极点。”

书中说，“美国对外政策上的好战、侵略、反苏以及温和、清醒、愿同苏联和平共处这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将继续下去，并将尖锐化”，“苏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两个对立倾向、两个派别之间斗争的过程和结局”。

对美国民主党大肆吹捧

书中说，美国“近几年来，出现了两党之间划清某种界限的趋向”，“民主党开始更多地指望工会、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群众基础，在对内对外政策上，民主党成了比较灵活，比较慎重和自由主义的国家管理方法的体现者”，“民主党在选举中则受到工人、职员、知识界、黑人的广泛支持，比较温和而冷静的资产阶级集团都向民主党靠拢”。这本书还说，民主党“表示准备‘欢迎’任何足以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缓和同美国的关系的迹象”。书中甚至引用肯尼迪临死前一个星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我们并没有发誓要对红色中国采取敌对政策”的谎言，来掩盖美国统治集团的反华政策。

极力颂扬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

对于艾森豪威尔，书中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在当时代表比较温和的、无意实行自己的冒险主张和冒大战危险的人士”，“似乎不能把他归入极端军国主义分子一类”。书中说，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透过‘冷战’的浓雾，第一次露出了阳光，出现了某种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最初征兆”。书中认为，“艾森豪威尔实质上是不公开的两党反孤立主义集团的代表人物”。

对于肯尼迪，全书从头到尾不遗余力地加以吹捧。书中说，肯尼迪是“受人民欢迎的”总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了解核时代的现实性，了解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在自己的讲话和信件中一向为举行关于有争论的国际问题的谈判敞开着大门。肯尼迪在一九六〇年选举中曾答应保证持久和平，他表现出他是一个比他的前任更善于同苏联打交道的人。”“如果把肯尼迪政府发表爱好和平的言论和采取爱好和平的行动仅仅看成是竞选动机，那是错误的”。

书中吹嘘肯尼迪上台后，极力要同苏联进行合作，说什么“在他惨遭毒手之前，旨在认真改善美苏关系、消除‘冷战’的路线是日益明显而清楚的”。书中说，肯尼迪“呼吁停止冷战，寻求裁军的途径。肯尼迪极力说服人们必须重新审查美国对苏联的态度”。“肯尼迪认为可以而且必须用和平方法消除现有分歧，也就是保障和平共处”。

书中引用所谓“美国温和的、头脑清醒的人士”的意见，说肯尼迪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及时止步，因为他了解入侵古巴会引起热核灾难”。书中吹捧“肯尼迪在加勒比海危机最后阶段所起的作用”，“使他的声望升到了空前的高度”。“有一定的理由可以说，一九六三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转折点”。书中还吹捧“肯尼迪总统眼界宽阔，冷静地对待国际生活的迫切问题，愿意谋求某种同社会主义世界的‘临时协定’”。书中还引述了赫鲁晓夫在肯尼迪被刺丧命后打给约翰逊的电报中的话：“肯尼迪的逝世是对所有珍视和平与美苏合作事业的人的打击。”

对于疯狂扩大侵越战争的美国现任总统约翰逊，书中说，他“是一个能在各种不同的政治派别中随机应变而不倾向于政治冒险的活动家”，他“很注意于履行自己的竞选诺言”。“在竞选运动期间，约翰逊非常坚决地主张和平共处，主张防止热核灾难，主张停止‘冷战’，主张彻底改善苏美关系”。书中说，美国“一九六四年的大选，成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全民投票，而在这次全民投票中，约翰逊得到人民的绝对委任，去实现旨在巩固和平、消除‘冷战’、谋求苏美接近的政策”。书中还说什么“应该为约翰逊这位富有经验而且非常慎重而温和的政治家说句公道话：在一九六四年的竞选运动中，他至少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接受了戈德华特的挑战，并且以多少明智一些的、现实主义的国际合作及缓和紧张局势的口号来对抗了政治冒险主义和好战的侵略性纲领”。

书中对约翰逊寄予很大的希望，说“约翰逊和民主党将在一九六八年的大选中获得胜利。换言之，应该认为，在最近八年中（一九六四到一九七二年）美国对外政策的领导权将操在约翰逊和民主党手里。约翰逊在大选中获胜主要是由于他的对外政策纲领，他应许遵循已故肯尼迪总统的对外政策的方针”。

此外，书中还吹捧美国现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富有魄力”，甚至把臭名昭著的战争贩



子麦克阿瑟美化为什么“温和、冷静、现实政策的拥护者”。书中还把美国现任副总统汉弗莱、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等人美化为什么“国会中的‘左翼’自由派”，说他们常常“从左的方面对民主党政府外交活动进行批评”，“往往本着和平共处的精神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建议，并反对美国的侵略性挑衅行为”。

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

书中为了替所谓“温和的”、“头脑清醒的”美国总统在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上的“独立作用”制造理论根据，强调美国政府的“独立性”，实际上把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书中说，“对外政策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增长了，统治阵营中围绕着国际问题而进行的斗争尖锐化了，这些情况都进一步加强国家（例如总统，政府机构，特别是外交机构和军事机构）在制定和实行对外政策方针中的相对独立的作用”。

书中诬蔑斯大林关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服从垄断组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胡说斯大林的这种理论“轻视国家的作用，贬低国家的意义，否认国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积极性，把国家贬低为某一个私人银行或托拉斯的奴仆”。

宣扬苏美的“共同利益”和“友好合作传统”

书中在描述苏美关系的“历史性质和历史传统”时写道：“美国和俄国曾经是由传统的友好和合作联系着的”，“除开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美国参加对苏俄的军事干涉这个污点之外，俄美和苏美关系没有为任何军事冲突和战争的乌云所笼罩。相反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苏联曾经是战友，这可以证明两国民族利益的共同性”。

书中认为“苏美关系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就是在现在，两国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领土的、经济的争执和冲突，它们的民族利益，无论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或者在任何局部地区的范围内，都没有互相冲突。”

鼓吹苏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书中说，“无论两个体系的对抗有多大，也有解决它的一把可靠的钥匙，就是列宁的天才的发现——和平共处原则”。书中说，“如果认识到热核战争的毁灭性而不容许热核战争发生，认识到和平共处作为国际生活的不可违反的准则是必需的，那么国际舞台上两种社会经济体系的竞赛和两个主要敌手的意识形态斗争，就将限定在没有流血冲突与战争的、广泛的经济、外交、科学和文化的竞赛与合作的范围之内”。

书中迫切祈求扩大苏美贸易，实现苏美合作，说“一九六三年底，美国国会同意向苏联出售粮食并允许总统给予相应的贷款的决定，可以说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开端”；又说，“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有九十二名美国银行及工业团体的著名活动家访问了莫斯科”后，“美国实业



家们答应利用自己的影响使苏美经济联系正常化并扩大这种联系”。

吹嘘苏美关系是“世界政治的轴心”

这本书说，“苏美关系，世界两大最强国家的关系，是世界政治的轴心，是国际和平的主要基础”。书中引用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的话，强调“两大国——苏联和美国——对世界命运，对人类命运的特殊责任”。书中说，“用他的话说，两国领导人‘了解到苏联政府的任何一个首脑和美国的任何一个总统，由于必要而承担着保持普遍和平的特殊责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前的核世纪承担着维护北半球生存的责任’。说得很好。”

书中说，苏联“致力于同美国的和平与合作，认为苏美关系是当代世界政治中的首要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关键”。

书中一再吹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可耻行径。书中说，苏美英三国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是美国政策上出现某种变化的标志”，“是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步骤，它表现出和平共处政策的生命力”，这个条约的签订是“全世界善良人们的巨大胜利”。

《苏联和美国

——它们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

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批准出版

B·A·瓦里科夫著

苏联“科学”出版社一九六五年出版

宣称苏联同美国全面合作的政策是不变的

这本书说，“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认为苏美关系的正常化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书中引用了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对赫鲁晓夫报告的决议中的这一论点：“改善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对于促进国际局势的健康发展，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苏联和美国是两个对普遍和平的命运负有特殊责任的国家。”

书中强调说，“苏联旨在同美国建立全面合作的政策是不变的”。

书中说，“苏维埃国家从其成立最初之日起就始终一贯地奉行同美国全面合作的方针”。“苏维埃国家从自己存在的最初之日起，就曾力求并且现在继续力求同美国建立事务合作和友好关系。苏维埃国家曾经一再提出关于建立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和发展全面合作的建议”。

书中说，“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一年苏美关系的历史令人信服地表明，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和



平共处、友好合作，既符合苏联和美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其他各国人民的利益”。

宣扬美国统治集团愿意同苏联共处和合作

这本书反复宣传“在美国过去发生作用和现在继续发生作用的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实行公开反苏政策”的趋势，一种是“同苏联建立合作和发展同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趋势”。

这本书说，“美国的许多国务活动家承认，像美国和苏联这样强大的国家，无论在战争年代，或者在战后时期，都能够共处和合作”。书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的苏美合作，为永远结束美国统治集团战前的不现实的和缺乏远见的对苏政策、为发展战后时期卓有成效的苏美关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本书赞扬美国统治集团中“比较有远见和头脑清醒的代表人物，都主张实行比较现实的对外政策，即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主张寻求同苏联进行有效谈判的途径的政策。他们清楚地理解到，在现时的国际局势中，美国 and 苏联之间唯一可以接受的合作基础是和平共处及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和其他方面进行竞赛”。

吹嘘苏美勾结联合行动的事实

书中宣扬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直接向美国政府提出改善两国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建议，并且列举一九五九年以来苏美两国在联合国的联合行动，以及一系列相互勾结的事例，来证明必须实现苏美合作。

书中说，“为联合国制定的关于全面彻底裁军决议的共同草案（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联合国关于为和平目的利用宇宙空间的共同决议（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苏美向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关于裁军原则的共同提案，以及专为和平日的利用南极洲的协定，苏联科学院和美国国家航空与宇宙空间研究局之间于一九六三年六月八日缔结的关于宇宙的协定，都是苏美两国间可能进行事务合作的标志”。

书中大肆吹嘘臭名远扬的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说“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根据苏、美、英三国政府的协议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的条约，以及根据苏联和美国的相互谅解并在一九六三年十月第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上一致通过的关于不把带有核武器或其他任何种类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投入环绕地球的宇宙轨道的决议，在全世界得到重大的反应。这些决议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改善各国间，其中也包括苏美间的相互关系，为巩固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也就是说为采取新步骤来使国际空气健康化，创造了前提”。

书中最后吹嘘说，苏美合作关系的发展，“不仅对苏美两国人民，而且对全人类的命运，都是生命攸关地必要的”。



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的时代开始了

本刊评论员

一个前所未有的群众学习理论的运动，正在全国广泛深入地开展着，这就是工农兵群众自觉地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运动。学习的效果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工农兵群众不但能够学懂，而且学得很好，很会运用。

我们看到，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问题，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并且成为他们行动的指针。

我们看到，正确思想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又可以变物质，这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观点，工农兵群众已经越来越熟悉，并且在这个观点的指导下创造着无穷的物质财富。

我们看到，“一分为二”，即对立统一规律，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在工农兵群众中，已经不是什么陌生的道理，大家正在实际生活中广泛地运用着。

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①又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②。在今天的中国，理论掌握了群众，群众掌握了理论，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群众手中最强有力的精神武器。

工农兵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提高了觉悟，就懂得了为革命而做工，为革命而种田，为革命而练兵打仗。他们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寻找工作中的规律，就更会做工，更会种田，更会练兵打仗了。各行各业的人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懂得了为革命而工作，也就更会工作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斗争中，不断

^{①②}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60、467页。



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广大劳动人民一直被关在理论知识的大门之外。一提起理论，人们就会想到这只是知识分子的事情。无产阶级虽然早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但毕竟还是少数。在今天的中国，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闯开了理论知识的大门，开始掌握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也开始掌握自然科学的理论。从此，理论开始从课堂、研究室解放出来了，少数知识分子垄断理论的局面被打破了，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的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具有不可估量的伟大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伟大意义必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然而，正像一切新事物的出现都会遇到旧势力的阻碍、都要经过斗争一样，工农兵学理论，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赞成的，也是有斗争的。有的人，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在一切方面都不相信群众，瞧不起群众，也不相信工农兵群众能够学理论。几年以前，当群众学理论的高潮已经兴起的时候，就有人对这一新事物大肆攻击，说群众学理论是什么“即景生情，就事论事”，是“枝枝节节地学”，“不系统”，破坏了理论的“完整的体系”，甚至诬蔑这是“一股邪风”，是“稀奇古怪的事”，给理论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反面教材”。由于工农兵群众开始学哲学、用哲学，这种企图垄断哲学理论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就说什么自己做理论工作是“倒霉”的职业，感到“最灰溜溜的”。几年来，工农兵学理论，采取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的方法，取得了立竿见影的巨大成就，最有力地回答了那些毫无根据的谬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他们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这本来是应当的、正常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地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群众应当懂、也能够懂的。江苏省一位贫农妇女，同大家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人怕她听不懂，她说：“毛主席的话是对我们贫下中农说的，又不是对地主富农说的，为什么听不懂？”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旧时代不可能在广大群众中实现，只有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毛泽东时代，才能实现。

一八九五年，列宁曾经说过，沙皇大臣先生非常害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大臣把工人看成火药，把知识和教育看成火星；大臣确信，火星一旦落到火药上，首先被炸的就是沙



皇政府。列宁说：“工人们！你们看，我们的大臣们多么害怕知识和工人的结合！你们应当向所有的人表明：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工人的觉醒！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他们就拥有了力量！”^①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

那种害怕知识和工人的结合，害怕工人的觉醒，害怕工人有了力量的人，那种反对人民脱离愚昧状态，反对人民作历史的主人的人，当然会认为群众学理论是“稀奇古怪的事”。工农兵群众掌握了理论，就能更加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掌握国家的命运，使那些想用书本知识作本钱，贩卖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企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的人，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他们当然会感到最“倒霉”，最“灰溜溜的”。

对于群众学习理论，掌握理论，我们认为正常的，是正风，是正面教材，资产阶级理论家却认为是“奇怪”的，是“邪风”，是“反面教材”。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思想同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斗争，是理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看到这个问题的性质和它的重要意义，自觉地进行这种斗争，才能把群众学理论这一件大事做得更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知识和工农兵群众更好地结合起来，使群众更加聪明，更加有力量。

工农兵群众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知识，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这是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最重要保证，也是防止产生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保证。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面前，国内国外的阶级敌人，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都会碰得粉身碎骨。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国家在政治思想方面头等重要的基本建设，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大事，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大事，是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对于广大干部的学习，会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在一切群众运动中走在前面，就必须首先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方面走在群众的前面。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干部教育的最重要内容，也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内容。只有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才能有力地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思潮的斗

^① 《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8页。



争，才能有力地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才能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才能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提高、不断前进。不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思想上就会掉队，工作上就会掉队。不掌握毛泽东思想，就失掉了领导群众前进的最基本的条件。在这一点上不觉悟，那是很危险的。如果有的地方存在着干部不如群众学得好，领导干部不如一般干部学得好的情况，那就应当迅速改变。

工农兵学理论所以学得好，同他们采取活学活用的方法是分不开的。我们要向工农兵群众学习，学习他们活学活用的方法。

活学活用的方法，是毛泽东同志所一贯提倡的，广大工农兵群众运用得很好。他们带着问题学，学了就用，边学边用。他们运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既做好了工作，收到了改造客观世界的成效，又提高了思想，收到了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效。工农兵的很多好文章，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来的。这些文章，生动活泼，内容丰富，通过具体的斗争生活，用群众的语言，把哲学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这样的文章，使人爱看，看了很有用处。有人可能不承认这些文章是哲学文章、理论文章。我们说，不对。这样的文章是很好的哲学文章、理论文章。因为它是从社会实践中，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社会实践中产生，又是用来指导社会实践的。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死学不用。死学不用的人，关在房子里死啃书本，死抠概念，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不分析实际问题，不解决实际问题。这样学习的结果，还是只会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会讲、会写，就是不会用，讲起来似乎头头是道，一接触实际斗争就束手无策，分不清是非。这样的学习，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样的人写出来的文章，尽是知识分子腔调，毫无实际内容。这样的文章，很少有人能够看懂；看懂了，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它不能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专门从事哲学、经济学等等理论工作的人，有必要来一个革命，从书斋里走出来，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连队去，到商店去，联系群众，深入实际，改造思想。只有深入实际，研究实际生活中的哲学、经济学，把实践经验加以总结，上升为理论，能够回答现实斗争中出现的新问题，这样的理论工作才是有用处的。这样，也就能够写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了。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最高指示。只要我们采取活学活用的方法，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



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运用《实践论》总结民间测天经验

湖南省南县气象服务站 段春作

一九三九年，我出生在一个贫农的家庭里。小时候，给地主放过牛，逃过荒，讨过饭，整年过着流浪的生活。解放后，党和毛主席把我从苦海里救出来，让我上了学。一九五八年，我读完了初中一年级。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领导上调我到县里学习气象。在县里学习了二十天，回到公社担任气象员。

开始，我工作很积极。但过了不多久，有些不安心了。我想，在县里学到的气象理论知识很少，工作的条件又差，没有一样仪器，连测定空气温度的温度表也没有，怎么开展工作、作天气预报呢？我怕万一搞不好，落得人家笑话，不如早改行好。

正当我有些不安心的时候，在国营农场工作的哥哥给我来了信，叮嘱我不要忘记过去的苦，不要忘记解放前在长沙街头流浪求乞的生活，要我听党的话，安心做好气象工作。这使我回忆起了解放前苦难生活的情景。我是党和毛主席救出来的一个苦孩子，

怎么能为自己打算，不听党的话呢？不能！我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我不能辜负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我的思想通了。

接着，就在党组织的指引下学习了毛主席著作。通过学习，更加鼓舞了我的勇气，使我下定了决心，干一辈子气象工作，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几年来，我反复学习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实践论》、《矛盾论》等二十多篇文章。在学习的过程中，使我逐渐提高了阶级觉悟，懂得了做气象工作就是干革命，就是要为人民“管好天”。特别是自一九六〇年以后，我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实践论》的观点，向群众学习，和同志们一起大搞科学实验，从实践中探索了民间土法测天的经验。

向群众请教

思想问题一解决，工作干劲就大了。我



恨不得一下子就建立气象哨，作起天气预报来。但是，客观困难还是存在的。知识缺，条件差。怎么办？正在焦急的时候，公社党委书记开导我说：“没有洋的就搞土的。搞科学实验，要走群众路线，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党委书记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进一步帮助我树立了克服困难的信心与决心。

我在领导的帮助下，反复地学习了《实践论》这篇文章，初步认识到人要有知识就得参加实践的真理。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看天经验。要做好气象工作，必须向群众请教。但是，如何去向群众请教呢？这还是一个难题。这时，正好有一位贫农社员给我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他们那里有个很会看天的老农。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满怀信心地去访问这位老农，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看天的经验。谁知一访问这位老农，他却说：“没有什么说的。我们是老一套，老迷信。现在要搞新技术。”问来问去，老人总是不肯说。这次，我一无所获地回来了。

老人为什么不肯说呢？我认真地检查了自己的态度和方法，找到了老农不肯说的主要原因，是我的访问方法不对头。我去请教老农的时候，左手拿着笔记本，右手拿着钢笔，那个样子好像在逼着他说一样。所以，他干脆不说。我总结了这次教训以后，在调查中就注意了方法。一般都是先和群众一起劳动，在劳动中建立了感情；然后谈家常，谈农业生产；最后再扯到看天的事情上来。以后，我访问有看天经验的老农，都是用这种方法才访问成功的。

我听人说老农邓乐南有一本记载我国古

人的测天经验的书。但开始他一直不肯拿出来。后来通过共同劳动和广泛地接触，他不但把书拿出来了，而且还告诉我“老云接驾，不阴就下”，“太阳笑，淋破庙”等民间的测天谚语三十多条。他交给我的那本古书和后来发现的其他几本古书，虽然其中大部分是一些带有封建迷信的东西，但也有一部分是记载我国古人的测天经验的。这些经验，绝大部分在今天仍然适用。如“清晨起海云，风雨霎时辰”，“西北黑云生，雷雨必震声”等一百多条谚语，对于观测天气变化很有参考价值。最后，邓乐南还告诉我用蚂蟥、青蛙等动物测天的方法。这使我初步尝到了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好处。

为了更好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做气象工作，我又在附近生产队邀集了五个有丰富看天经验的老农，组成一个“五人看天小组”。我们经常在一起，边参加生产劳动，边观察天气的变化。

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办，虚心向贫农、下中农学习，使我逐步与贫农、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在工作上，他们处处支持我。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思想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们公社有个六十多岁的老贫农木匠杜洪光，趁早晚休息时间帮助我做百叶箱，还经常鼓励我好好干气象工作。有一次，他看到我工作上遇到了困难，心里烦恼，就劝我说：“搞气象就是好，有作用。”同时，还对我说了一件辛酸的往事。他告诉我，解放前的一九四七年，他的两个儿子帮地主到大通湖捞湖草，突然遇上大风，翻了船，活活地被淹死了。和他的儿子一道淹死的，还有五十多个贫农兄弟。他流着眼泪说：“要是



现在，我的两个儿子和那些贫农兄弟就不会淹死了。”听了老人的这段话，我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我们的阶级兄弟是多么盼望建立自己的气象哨啊！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在气象工作岗位上的责任。

从实践中大量搜集感性材料

老农邓乐南告诉我：“蚂蟥可以测天。蚂蟥浮上水面或爬到田坎上来会下雨。”我就弄来了一条大蚂蟥，把它放在盛着水的玻璃瓶里试验。但是在下雨前，蚂蟥却睡在瓶子底下一动也不动。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我一试验就不准呢？我没有灰心，仍然继续观察试验。我又从稻田里、沟港湖泊里寻来了十多条蚂蟥，按它们的大小和颜色分别放在六个玻璃瓶子里，进行观察。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天空晴朗无云，我和公社气象哨的崔淑纯同志发现十多条蚂蟥大部分都越瓶逃跑了。这种情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立即到附近生产队，同“看天小组”的老农进行研究，作出了当天下午到傍晚有寒潮侵入和有七—八级偏北大风的预报。结果，在当天傍晚果然寒潮来了，刮起了九级大风，并下了冰雹。当时，我们公社的大批种谷下泥才只有五天左右，正是出苗期间。由于公社党委动员快，事先作好了防备，保证了全公社已播下的三千三百五十八亩秧苗基本上没有受损失。这次预报准了，使我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也使我认识到科学实验的重要性。从此，做好气象科学实验的信心就更大了。

做好工作的强烈愿望，使我更广泛、更深入地去接近群众，向群众学习。不管晴天

雨天，不管白天晚上，不管路途远近，只要知道哪里有会看天气的老农、老渔民、老船民，我就去拜访求教。几年来，我先后进行了二百六十七次调查访问，共访问老农二百四十二人，老船民六十五人（包括摇摆渡的老人），老渔民四十八人，对天气变化有反应的慢性病人三十一人（如患关节炎、鼻炎的病人），共收集了民间测天谚语一千一百零六条，农谚一百八十五条，学到了不少宝贵的看天经验。例如，“死水鼓泡，大风就到”，“游鱼跳水有大风”，“小鱼巡边有大风”等这些专门预测大风的谚语，就是从渔民那里收集来的，是他们多年积累下来的测天经验。

一九六〇年二月，我参加全省在株洲市召开的科学技术经验交流会议时，听到参加会的同志们介绍如何以《实践论》为武器指导科学实验，解决科学研究中的疑难问题的经验，对我帮助很大。

这时，我又一次学习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实践论》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①。读到这里，我就想到，搞气象不能光听别人说，自己应该亲手做一做，亲眼看一看，样样试一试。毛主席的话，启发了我大胆设想，广泛试验。我开始用民间还没有发现能预测天气的动物、植物、家具等进行观察试验，开辟了搜集感性材料的新途径。从蚂蟥能测天想到田螺，从田螺想到蚯蚓，从动物想到植物，从植物想到家具和器具。如我在食堂吃饭时，发现屋中央的彩球有时碰脑袋，有时又自动升高了不碰脑袋。彩球为什么有升降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6页。



的变化呢？我认真地进行了观察记载，终于发现彩球在晴前升高、在雨前下降的规律性。后来，根据彩球的这种性能，做成一个“绉纸晴雨计”。又如，我把明矾水涂在马粪纸上，又把食盐水涂在另一张马粪纸上。长期观察后发现，大雨前，涂明矾水的一张纸颜色变白，涂食盐水的一张颜色变暗（黑）。根据这些现象，我在一张大的马粪纸上用蘸满食盐水的毛笔写一个“雨”字；再把笔洗干净，在字的周围涂上明矾水。这样做好后，晴天马粪纸上什么也看不到，但在下大雨之前，“雨”字慢慢现出来了。这样，就制作成了一个“见字天变”的土仪器。另外，还做出了“电示晴雨计”、“竹叉子晴雨计”等，并发现了四叶草、含羞草等植物能测天。几年来，共做了五百八十六项试验，获得成功的有一百一十项。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通过艰苦的收集与大量的试验，得到了较丰富的感性材料。但这些材料又多又杂，有时又自相矛盾，到底谁是谁非，弄不明白。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说：“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①我想，我所掌握的材料一定有“真”的和“伪”的，需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改造制作工作。我将一千一百零六条民间测天谚语逐一试验、查对、鉴定，归纳为科学的、巧合的、迷信的三类。结果，肯定了五

百二十条是科学的，三百一十六条是巧合的，二百七十条是迷信的。例如，“正月初一刮南风，屋檐底下躲虾公”这条谚语，它的意思是，正月初一刮了南风，预兆这一年雨水多，有大水。我找了南县、大通湖、常德等地的气象资料进行查对，了解到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〇年这十一年中，有六年正月初一刮了南风，但是这六年雨水都不很多，特别是其中两年还出现了较严重的旱象。这就证明，这条谚语是没有根据的。一九六〇年，我二十四次观察记载了“乌云接落日”的景象。结果是，十九次在当晚或第二天都下了雨，五次没有下雨，但也阴了好几天。这就证明了“乌云接落日，不落今日落明日”这条谚语是具有科学性的。

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之后，对感性材料进行了一些提炼。但是，这些动物、植物和谚语为什么能预测天气，却不懂其中的道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曾先后到南县、长沙市借过和买过很多气象理论书籍，自学理论知识。开始，虽然被“大气环流”、“锋”、“高压”、“低压”、“脊”、“槽”等科学名词难住了，但是我坚持学下去，学不懂的就请教有专业知识的同志。这样，学到了一些基本气象理论知识。不过，对于动物、植物测天和谚语测天的道理，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后来，又反复学《实践论》。毛主席告诉我们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0页。



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①“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这句话多么重要啊！毛主席的教导，使我决心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进一步在实践中进行实验分析。我在大量进行试验的基础上，采用“深入虎穴”、重点突破的方法，集中精力抓住一、两个项目，进行跟踪追迹的试验、观察，深入探讨动物、植物和谚语测天的科学道理。

例如，我细致地观察了青蛙与气象变化的关系。青蛙的叫声为什么能预报天气呢？为了找到这个原因，我采用“虎穴追踪”的办法，到田野里，蹲在青蛙后面观察它的动态，听它的叫声。晴天看，雨天看。经过反复观察，发现青蛙头部两侧各有一个气包，这两个气包一开一合，就发出了声音。晴天叫得很自然，声音前后一样大，很响亮；暴风、雷雨来到前六小时左右，它的动态和叫声就不同了，一声大，二声小，叫时全身发抖。为什么这两个气包能预测天气呢？我又捉来了大的、小的、麻的、绿的等多种青蛙进行解剖。通过解剖观察，发现青蛙的两个气包是一层很薄的膜，用草管插进去一吹，气包也是一鼓一鼓的。这时我联系到书本上的知识，明白了气压的剧烈升降引起了青蛙的不同叫声，找到了青蛙能测天的原因。

这样反复多次试验，使我懂得了动物、植物的变化与气压、湿度和温度等气象要素有关系的道理，使感性认识初步上升到了理性认识。

对民间谚语测天，我们也进行了反复的观察、试验。为了弄清“太阳笑，淋破庙”这句谚语的道理，我曾苦苦思考。一天，天空出现了太阳笑的景象。晚上，我把煤油灯点

燃，罩上灯罩，出现的情景，与白天出现的“太阳笑”相差不多。我马上把灯罩用布擦干净，再罩上去，灯光又不“笑”了。我反复作了试验。擦干后罩上去，灯光明亮（不笑）；再对罩内哈进几口热气，灯光就模糊（笑）。我想，玻璃灯罩是透明的，空气也是透明的；灯罩上有水汽，有灰尘，灯光就“笑”，与空气中水汽多、灰尘多，太阳就“笑”是一个道理。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了解到空气中水汽多，含尘量大，正是下雨的重要条件之一，从而找到了“太阳笑，淋破庙”这条谚语的科学道理。

有一次，我观察蚂蟥对天气的反应时，发现黄、绿、麻三种蚂蟥浮起来了，其他三种蚂蟥却无反应。到底有没有雨呢？我拿不定主意。最后用折衷的办法，预报“晴天多云”。结果，第二天却下了一场雨。预报失败了。

这次预报失败，促使我深入地探讨六种蚂蟥的反应不一样的原因。我又认真地学习了《动物学》和《普通植物学》等书籍，初步了解了各种动物、植物的生理特点和生活习性。我重点地翻阅了介绍蚂蟥的生活特性和生活环境的书籍，查阅了有关的参考资料，系统地整理和分析了以往所记载的六种蚂蟥的资料，终于发现蚂蟥对于天气的反应有季节性的特点。大的黄色的蚂蟥，在春季反应最灵敏，麻色的在夏季反应最灵敏，灰色的在秋季反应最灵敏，绿色的和白色的在冬季反应最灵敏。其中，黄蚂蟥除春季反应最灵敏，绿蚂蟥除冬季反应最灵敏外，在其他季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页。



节也有反应。

蚂蟥对天气的反应有季节性,其他动物、植物对天气的反应有没有季节性呢?我又对青蛙、蚂蚁、含羞草等一百多种能预报天气变化的动物、植物一项一项地进行考察,发现了动物、植物测天有个共同特点——季节性。根据这根线索,跟踪追迹,又发现青蛙测雷暴雨最准,鳅鱼测雷雨很准,鸡鸭报晴雨最准,蚯蚓报大雨很准,等等,各有所长。这就又发现了动物、植物测天的一个共同特点——独特性。这样紧紧追索,经过一年多工夫,找出了动物、植物测天的六个特点,即季节性、独特性、生活习性、地方性、时间性、综合性,进一步认识了利用动物、植物测天的方法问题。

这时,我又考虑,动物、植物测天有“六性”的特点,民间谚语测天有没有规律可循呢?通过认真摸索,终于又发现了民间天气谚语测天的相关性、季节性、地方性、准确性、时间性、比较性等“六性”的特点,找到了进一步运用民间谚语测天的方法。

一九六〇年,在领导的鼓励、支持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初步总结了几年来向群众学习和进行科学实验的成果,写成了《民间测天法》一书。

反复实践,检验理论,不断发展

写成《民间测天法》,这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按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阐明的人的认识过程来说,这只不过是完成了认识过程的一半,而且是不十分重要的一半。怎样去完成更重要的一半呢?怎样用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改造世界呢?

我体会到,要使我们的认识更符合实际,就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到生产实践中去检验理论的真理性。

毛主席说,要完全解决理论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①。又说:“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②

我们革命者认识事物客观规律的目的,在于指导革命的实践。我研究物象测天的规律和谚语测天的规律,目的是为了报准天气,为农业生产服务。如果掌握了理论,不在实践中运用和检验,只是空谈一阵,这种理论是没有用的。

为了用于生产,进一步检验物象、天象测天的“六性”的准确性,从一九六〇年起,我就着手按“六性”的标准将各种物象、天象分类排队,分别进行检验。

例如,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七日,我发现蚂蟥越瓶逃走,猫头鹰偏头低飞,燕子低飞等象征,根据动物测天的独特性的特点,立刻发出大风警报。第二天,果然刮起了八级左右的大风。由于早有准备,社员们避免了生命财产的损失。这就进一步证实了物象测天的独特性是正确的。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五日,我们根据蚂蟥浮游、泥鳅乱跳、“绉纸晴雨计”下降等物象的反应,和“日出紫云生,午后雷雨鸣”等天象反应,预报当天午后有雷阵雨出现。公社各生产队收到预报后,突击抢收了晒场的

^{①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1页。



稻谷。午后，果然下了一场雷雨。由于准备工作做得早，全公社二十六万多斤谷子没有受损失。

就这样，一次、二次、三次、无数次，大部分灾害性天气基本上预报得准确。在为生产服务的不断实践中，进一步证实了这些方法和理论的正确性。

再就是，通过实践去纠正理论的不完全性。在摸索到了物象测天“六性”和谚语测天“六性”之后，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在实践中亲手试验过的，是一些靠得住的东西。但是，《实践论》中说：“许多理论的真理性的不完全性，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①我读到这里，对自己认为“靠得住”的东西是不是完全可靠，产生了疑问。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还需要将自己的理性认识放到实践中去不断检验。

怎样去检验呢？我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查对几年的观测记载资料；一是在实践中考察。一天，我看到太阳落水时，西方有云上升。按照“日落云长，半夜听雨响”这条谚语的说法，当天半夜有雨下。可是，一直到天亮时才下雨。我在资料上查对，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三年出现的三十二次“日落云长”的现象，有十九次第二天上午才下雨，一次是第二天下午，两次是当晚上半夜，半夜下雨的只有六次，还有四次没有下雨。后来，我们又对其他几百条谚语进行了考察工作，发现谚语测天的时间变化差距较大，需要灵活掌握。这样，我又发现了谚语测天具

有灵活性的特点，将谚语的测天“六性”发展到“七性”。

在运用物象测天方面，开始时，认为盐缸子、盐水浸的复写纸等盐类器具对预报大雨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在不断实践中发现，这些器具在天气突变，如下雷阵雨时，事先没有反应，而雨来了以后才有反应。这样，进一步补充了原来认识的不完全。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一再指出：认识是无止境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②。认识是无穷的，我对气象规律的认识，也应当是不断实践，不断摸索。在收集和运用群众谚语的同时，我们又新编了“云无根，雨无踪”，“馒头云，晒死人”，“梭子云，定天晴”等四十多条看天谚语。可见，只有不断实践，才能使认识不断发展。

为了使气象工作更紧密地为当地农业生产服务，我们探索了气象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有一次，我和社员一起翻粪堆。我问老农，肥料怎样才能腐烂得快，才能肥效高呢？老农说，最好是晴天，水里、泥里的热度高，肥料发酵快，肥效才会高。老农的回答使我了解到，肥料问题与气象条件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能不能让气象工作突破常规，更进一步地为生产服务呢？从那时起，我又开始琢磨水、泥的温度和气象之间的关系。我在生产队选了五个地势、水源、土壤大致相同的粪堆作五个观测试验点。在每个点上安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1—282、285页。



装测量水、泥温度的温度表，不分晴雨进行每天六次的连续观测。经过几个月的观测分析，和农业技术干部、老农一起总结了一套造肥、保肥办法，初步找到了在不同天气条件下水、泥温度的变化规律，及其对肥料腐化的影响等指标。接着，我又采取措施来提高畦内的水、泥温度。通过多次试验，摸索出了秋季晴天畦内浅灌水，可以提高水、泥温度，加速肥料腐烂的经验。

这几年，在气象工作岗位上，我所以能够虚心向群众请教，搜集群众看天的经验，进行观测试验研究工作，探讨了民间测天的经验，最主要的体会，就是必须带着革命的阶级感情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毛主席的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书。《实践论》是一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著作。只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培养真挚的无产阶级感情，才会相信群众，下决心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在群众面前甘当小学生。深入群众，是认识事物、改造社会的开始。也只有这样，才使我们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实践；对《实践论》才学得进，用得上。

在学习《实践论》时，要边学边实践，带着问题学。如我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十六个字的指导下，去掉迷信谚语，提炼科学谚语，寻求物象、天象测天和谚语测天的规律性等，就是通过多次学、多次用才解决的。学一点，用一点，有时甚至对一句话、几个字都需要反复思考，才能领会其精神实质。在工作中，在

科学实验中碰到了问题，就去请教《实践论》，在学习中得到启发后，又去找工作上的问题。

学习和运用《实践论》，还必须有股闯劲、“傻”劲和钻劲。

闯劲，就是说学习《实践论》，运用《实践论》，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难关是很多的，遇到难关，就需要有一股革命的闯劲，敢于去闯出自己的路子来。不过，这个闯劲，应该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去闯。盲目地闯，是闯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傻”劲，就是说在运用《实践论》搞科学实验时，要有一股革命的“傻”气。搞科学实验要想闯出一条路子来，非有“傻”劲不行。我整天跟在青蛙背后，观其动态，听其声音，又捉来进行解剖，有个别人讽刺我是呆子，是干蠢事。实验的最终结果回答了他们：一项科学实验的成功，是需要一些“傻子”去做“笨事”的。实践教育了我，只要专心专意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总是会有结果的。

钻劲，就是说要认真钻研，不怕困难，不怕失败，一个一个的问题要钻透。学习《实践论》，要钻，才学得懂。要钻，才学得深，用得好，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我感到自己学习得还很不够，像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一样，才摸到门，离开党和人民对我的要求还远得很。我要永远记住毛主席说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继续努力，不断实践，不断前进。



《矛盾论》的思想进了水泥窑

牡丹江水泥厂看火工人 刘培顺

我是牡丹江水泥厂的看火工人。我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几年来，我和小组的同志们一起，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把《矛盾论》的哲学观点请进了水泥窑，在生产上取得了一些成效。

在水泥窑生产中 人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带着怎样认识和解决人和窑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来学习的。

一九五一年我开始学习看火。一九五四年，领导上叫我独立操作。当时，我感到担子很重。因为水泥窑是全厂的“心脏”，能不能管好，对水泥质量的好坏和产量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看火工人是直接掌握水泥窑的。党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心里觉得挺光荣，决心要把水泥窑管好，不辜负党和国家对自己的信任。

可是，那个时候，想的和干的总是对不上茬，劲没少费，活却没干好。今天合适的火候，到明天就不合适了，甚至这个钟点合适的火候，到了下一个钟点又不管用了。一

天弄得手忙脚乱，还免不了出漏子。记得有一次，我接班以后，窑里温度一连三、四个钟头都比较正常。后来温度有点升高了，我就把给煤量调整了一下，但温度还是继续上升。这时，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眼看着温度升高，也不敢去处理，结果不到一个钟头的工夫就把窑烧垮了，造成一次重大责任事故。

当时，我又着急又难过，悔恨自己做学徒的时候为啥不下功夫呢！可是，后来发现不光我这样，其他两个班的老师傅，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也没有办法。有人说：“水泥窑这个玩艺，干好了是瞎猫碰着了死耗子；要是碰不准，累死也干不好。”由于我没有掌握住水泥窑的生产规律，工作一直很被动。

一九五八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导下，全国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这个时候，党组织领导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学习中，我首先懂得了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只要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因素，就能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就打



开了我心里的闷葫芦。事是人干出来的，路是人走出来的；破坏一个旧世界靠人，建设一个新世界也靠人。我厂水泥窑的每小时产量，由生产初期十几吨达到了二十九吨，这还不是人的因素起了决定作用吗？想到这里，我的胆子就大了，敢和水泥窑斗了。今天斗不过，明天还和它斗，早晚会斗赢的。

怎么样斗？毛主席说过：“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①毛主席的这个思想，完全适用于水泥窑的生产。对于水泥窑，我们既要敢于斗，又要善于斗。这就是说，既要有革命精神，又要有科学态度。在斗它时，首先要重视它。如果只斗它，不重视它，就成了盲目的乱斗，必然会遭到失败；如果光重视它，不同它斗，还是摆不脱被动地位。

我和小组的同志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总结出了增大窑尾通风，提高水泥窑产量的经验，并在党委的大力支持下，对水泥窑进行了一些改革，增强了通风能力，使水泥窑的小时产量由二十九吨提高到三十三吨。

这个事实使我们初步认识到，人应当是窑的主人，窑是人们进行生产的工具。一定的物质条件是必需的，但是，生产的好和坏，归根到底取决于人，而不是取决于窑。人的作用发挥了，就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地去变革窑，更大地发挥窑的作用，生产就会不断地提高。

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 已有的经验

我们增大窑尾通风，提高了水泥窑的小时产量以后，在一段时间内，每当要想提高产量时，就设法增大窑尾通风。可是，后来增来增去，不仅产量没有继续提高，反而降低了。当时我很纳闷：这项经验，过去有效，为什么现在不管用了呢？想了很久也没有想通。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读了《实践论》。毛主席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②我领会毛主席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客观事物总是在发展变化的，人们的认识必须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不能一成不变。毛主席的话，使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用增大窑尾通风的办法，能够提高小时产量，是因为窑尾通风和窑头鼓风相适应了。就像烧火炕一样，烟筒堵了就倒风，排风过大就会把火焰抽到炕洞子里去，只有排风适当，炕才好烧。如果把增大窑尾通风看成是提高生产的唯一办法，不顾条件，无限度地去增大窑尾通风，结果就会把火焰拉得很长，降低烧成的温度，不能合理地使用火力。窑尾通风和窑头鼓风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一方超出另一方所允许的范围，就会造成比例失调，直接影响着火焰的长短和燃烧速度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



的快慢。懂得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相应地增大了窑的鼓风，生产情况就好转了。

这件事还证明：对在生产实践中取得的经验，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任何经验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在运用这些经验时，必须注意在实践中不断验证，并且根据实践中取得的新的经验加以发展。如果一成不变地把所有的经验都当成灵丹妙药，不顾客观条件的变化，不在实践中继续发展它，就会犯经验主义的毛病，好的经验也可能引出坏的结果，成功的经验也可能变成失败的因素。

一切从全局出发 充分发挥局部的作用

为了搞好水泥窑的生产，不仅要解决人和窑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解决人和人的关系。这是由水泥窑的生产特点所决定的。水泥窑生产是由几十个机台联系在一起、三班连续作业的。它的上下工序、上班和下班都是矛盾着、联系着的。在生产过程中，经常发生主机和附机、上班生产和下班生产的矛盾。例如，有的人为了完成本班生产任务，总喜欢把窑里的温度烧得高高的，结果是一个班烧窑，两个班保护窑，一个班完成任务，两个班完不成任务，甚至还有把窑烧垮的危险。老是这样干，不仅生产会遭到损失，还会造成三班之间的不团结。我觉得，这主要是由于有些人缺乏“一盘棋”的思想，考虑问题只从完成本班生产任务出发，而不是从完成三

班总的生产任务出发。

针对这个问题，我跟小组的同志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如何处理局部和全局关系的论述。从学习中，我们认识到，局部应当服从全局，因为丢掉了全局，局部再好也不顶用；但是，全局又是由局部构成的，如果局部都不好，全局也不会好。如果某项意见从局部看来是可行的，而从全局看来是不行的，局部就应当服从全局。反之，从局部看来是不行的，从全局看来是可行的，也应当服从全局。因此，我们要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局部的作用，正确地解决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才能把生产搞好。

在学习中，我首先检查了自己过去缺乏整体观念的错误思想，认识到只顾本班任务，不顾三班任务，是一种小生产者的狭隘思想的反映，不符合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大生产的需要。同志们也都联系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检查，提高了认识。有的同志说：“我们三个班在一个生产岗位上，用的是一个看火镜，烧的是一台窑，为的是一个目标。我们不仅要看到小组的生产任务，还要看到车间和全厂的生产任务，看到我们的生产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只顾完成本班任务，不顾完成整体任务观念，是错误的、渺小的！”

学了毛主席著作，我们的眼界宽广了，树立了以窑为重、以全局为重的思想，有利于本班、不利于全局的事情不做，有利于全局、不利于本班的事情也去做。三班之间更



加团结了。同时，我们还注意解决了上下工序之间的关系。这样，在我们小组就出现了一个上下工序一条线，三班拧成一股绳，互相协作，密切配合，搞好生产的好局面。

发扬先进因素，克服落后因素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我们小组的面貌焕然一新，几年来一直被评为省、市的先进集体。但是，在一九六四年大跃进、大跃进的热潮中，我们小组无论在工具管理、建立岗位责任制等方面，都落在了电工小组的后面。起初，这件事没引起我们的重视，有的同志说：“我们的家底厚，基础好，只要生产过得硬，啥也不怕。”党委号召全厂向电工小组学习，我们感到没啥学头，尽拿自己的长处比人家过去的短处，就是不跟人家比思想、比革命意志。这种骄傲自满的思想，很快就反映到生产上来。按上级领导要求，水泥窑的运转周期平均应为六十天。在一九六三年，我们的水泥窑曾经出现过两次八十天安全运转。但是，在一九六四年，安全运转却连续两次失败，第一次运转四十六天，第二次运转五十五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赶快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首先学习了《矛盾论》，懂得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电工小组之所以由落后变成先进，是由于他们敢于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有一股子永不自满、永远前进的革命精神。我们

小组之所以由先进变为落后，是由于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有了成绩就骄傲自满，碰到困难又灰心丧气。我们又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章，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在自觉的基础上，谈思想、摆认识，检查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思想。在检查的过程中，有的人说：“在生产上连续打了两次败仗，再从思想上揭露出一大堆问题，今年的先进小组不就垮了吗？”大家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毛主席说过：“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①要不要揭露矛盾，实质上是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揭露思想和工作上的缺点，只会把小组搞好。缺点是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你不搬开它，才真正会把小组搞垮。经过讨论以后，我们小组克服了“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认真对待生产中的问题，克服困难，搞好了生产。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

根据以往的经验，有人认为，水泥窑的运转，在实现一个长的周期之后，接着就会出现一个短的周期，“一长一短”是窑的运转“规律”，连续长期安全运转是不可能的。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如何掌握事物发展规律的论述，并对过去水泥窑运转周期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从过去几年的情况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页。



看,水泥窑运转确实有时是“一长一短”或“一长几短”地波动着的,没有出现过连续的长期安全运转,所以,就在一些人的头脑中造成了这个“规律”性的印象。但是,只要深入分析长的运转周期和短的运转周期的具体条件,就会暴露出“一长一短”或“一长几短”并不是必然的现象。例如:从几个周期的物质条件来看,都是相同的,但是,有的周期长,有的周期短。为什么在同样的物质条件下,运转周期会有差别呢?经过分析,我们认识到,水泥窑能否长期安全运转,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的因素。在同样的物质条件下,如果人们对它维护得好一些,发生问题时处理得及时一些,运转周期就可以长一些;如果人们对它维护得差一些,发现问题不及时处理,运转周期就要短一些。从此,我们奠定了争取长的运转周期的信心。

人们在生产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还表现在对生产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善于把不利的条件转化为有利的条件。例如,一九六四年,我们水泥窑要试用一种新的耐火砖。有人提出这种砖不好使,兄弟厂用了一个星期就把窑烧垮了,想用它来实现长期安全运转是办不到的。究竟能不能试用新的耐火砖,怎样看待兄弟厂的失败呢?我又跟小组同志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矛盾双方互相转化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论述。学习后,我们认识到,一切矛盾着的东西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失败和成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而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使失败转化为成功

的重要条件。因此,对于失败了的东西,也要做具体的分析,正确地对待它。于是,我们派人到兄弟厂了解了对这种砖的使用情况,自己也做了一些试验。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弄清了这种砖的特点是:不耐急冷急热,耐高温而不耐磨。我们现用的耐火砖,耐急冷急热的性能比较好,就是耐高温差一些。再分析我厂水泥窑的特点是,温度比较稳定,急冷急热现象少,熟料的颗粒也比较小。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定,新的耐火砖是可以使用的。在使用时,我们又把现用的耐火砖和试用的耐火砖交替镶砌,发挥了它们各自的长处,抵消了它们各自的短处。这样,就使水泥窑在当年实现了一次一百二十天的长期安全运转。

* * *

几年来,我们深刻认识到,生产本身是个千变万化的大的矛盾体,生产发展的过程也是矛盾转化的过程。人们对生产上的矛盾的不同反映,会形成正确与错误、先进与保守、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矛盾。对于这些矛盾,只要我们善于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就能够正确地认识 and 解决。

我们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提高生产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是很不够的。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水泥窑生产的规律,运转周期还不稳定,生产上的许多问题还需要继续解决。今后必须进一步地努力学习,改进工作,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一万公里和一公里

解放军某部运输连班长 赵 维 会

古话说：“千里大堤，溃之蚁穴”。为什么小小的一个蚁穴，可以使千里大堤崩溃？这是因为护堤人不把小小的蚁穴放在心上，麻痹大意。人们驾驶汽车时所以会发生事故，麻痹大意往往也同样是一个重要原因。

去年十二月份的一天，我和新驾驶员颜洪新一起出车，为了让他多得到些实际锻炼，我让他开车，一路上穿过大街小巷、公路山道，一直开到砖瓦厂，他又是倒车，又是拐弯，开的都很稳当。在把砖装满车开往工地的時候，汽车行驶在宽阔、平坦的公路上，颜洪新感觉有些疲劳，便停下车让我开。当时我心里想：你放心休息吧，方向盘在我手里，已安安全全地驾驶了一万多公里路啦。我开了起来，汽车没跑多远，发现前面公路两边停了二十多辆地排车，拉车的人都在公路边的树下休息。当时我便照着老经验作出判断：这是个“死情况”（意思是拉车人正在休息，不会走动），不减车速也问题不大。于是我喇叭也没多按，把住方向盘向前开去。谁知道，正在这当儿，停放在后一列的地排车中，意外地走出一个人。他一见到汽车，就惊慌失措地往路中间跑，汽车离他

只有两三米了，这时我非常紧张，连忙打方向盘带刹车，只听见“咋咋咋”的连声响，糟糕！汽车撞上了路边的地排车，虽然没有撞倒人，却轧坏了两部地排车，发生了事故，给国家带来了损失。

这次我只开了一公里的车，就造成了事故。事后，我深思了这个问题：以前我为什么能安全行车一万公里，现在却不能安全行车一公里呢？我想，行车一万公里没有事故，那是因为在历次行车中，在每一公里的路上都思想集中，驾驶谨慎。这次行车一公里，又是在平坦的大公路上，却发生了事故，这是因为我背上了“安全行车一万公里”的包袱，麻痹大意，忽略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作两种准备的必要性，看不到在“死情况”中会出现“活情况”的可能性。我只看到拉车人坐在公路边休息，没有估计到其中有人会走到公路中来的可能，只作一种打算，没有作另一种打算。等到事情的发展不符合我的判断的时候，就手忙脚乱，以致造成了事故。

事实证明，“一万公里安全”会转化为“一公里不安全”，这是并不奇怪的。在这



里，一万公里和一公里，安全和不安全，都是对立的统一。没有一公里、一公里的安全行车，就没有一万公里的行车无事故。反之，一旦有了“安全行车一万公里”的包袱，丧失警惕，那就可能会在一公里路上摔跤子。

自此以后，我就非常重视安全工作。今年我已行驶了三千多公里，可是每当我一上汽车，摸上方向盘，我所想到的就是：我正在走第一公里路。

（原载《解放军报》1965年7月22日）

“老规矩”是怎样一破再破的

——解放军某炊事班磨豆腐的故事

· 魏 勤 生 ·

某团部大灶食堂，一斤黄豆磨两斤多豆腐，算是“老规矩”了。老班长的班长传给老班长是磨两斤多，老班长传给新班长熊雨芳还是磨两斤多。虽说只磨两斤多，总比吃煮黄豆强。因此，也就没有人想到要改革、提高。

去年五月，三连竟然一斤黄豆磨出了四斤豆腐！这使熊雨芳吃了一惊，省悟到：“不能因循守旧，不能把老规矩看作一成不变，必须要有敢闯的精神，要去突破它。”于是，他们决心学三连、赶三连。

开头，事情进行得不很顺利。按照三连的办法磨出来的第一锅豆腐，不仅数量没有增加，质量也显著下降。豆浆在锅里一烧就结成了碎块，吃起来酸不溜溜的。接着又做

了四次，都和第一次差不多。不过，从多次的失败中，熊雨芳却也弄清了豆腐发酸的原因：豆子变了质。但是，每一次用的豆子都是好的，在哪一环上变的质呢？他们分析，最大的可能，是在泡豆子这道工序上。因为豆子是从晚上九点，直泡到早晨六点，时间长，又过了夜。是不是真是这个原因？他们想试验一下看。于是，先用两三斤黄豆，少泡了个把小时，果然强些；再少泡它个把小时，又强一些。这样一次次试验，终于发现：泡豆子的时间太长了，豆沫多，豆腐又少又酸；时间太短了，豆渣多，豆腐少；豆子泡得最理想的时间是泡三个半小时，看豆子表面很光滑，豆瓣的平面稍有点凹，这就正好。但是，熊雨芳又想：“为什么三连泡七、八个



小时磨出的豆腐又多又不走味呢？”一考察，发现三连用的豆子粒比较大。从此，他得到了一点启示：学习别人的经验，千万不能死搬硬套，因为事物是千差万别的，一定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但是，他们还只能磨出三斤半豆腐，比起三连，还差一点。既然差一点，就得赶上去。他们继续钻研、琢磨，发现自己在磨豆子的时候，不是水加多了，就是水加少了，这样就磨得不够细，出豆腐的数量就少。再经过实践、摸索，他们找到了水和豆子应有的比例关系。同时，也发现，磨子的好坏，对磨出豆浆的粗细也有关系。磨子好的，就少磨几圈添一次；磨子差的，就多磨几圈添一次。这样磨出的豆浆又细又均匀，豆腐也就出得多了。他们一斤豆子能出四斤多了。

四斤多，达到了当时所在部队的最高水平，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在这种时候，还要不要再敢想敢干地向前闯呢？熊雨芳认为：“还要闯。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你不闯，别人会闯，到时候，又只好落在别人后边。自己磨的豆腐，也还不是十全十美的呀！”于是，他们又进一步发动群众总结经验，找问题，想办法，攀登新的高峰。

新的问题果然找到了。过去，是在浆一烧沸，就点石膏，很难看准。看起来，明明点好了，过一会又发现点老了；少点一点，又太嫩了，压不成豆腐。是不是能够让它冷却

一会儿再点呢？他们重新进行试验，并且改变了操作方法。

第一次，放了十分钟，温度摄氏九十度左右，豆腐数量增加，质量较好；

第二次，时间长一些，温度低一些，又进了一步！

第三次，放了二十多分钟，温度摄氏七十度左右，糟糕！数量下降，味道又酸起来了。

什么原因？时间放长了？再做。

第四次，时间、温度完全和第三次一样，结果，豆腐出了五斤半，质量优等，能炒、能煎、能炸、能煮。

怪呀，第三次和第四次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一研究，原来第三次所以失败，是因为点好石膏以后，忙着做饭，多放了两个多小时才去压成豆腐，再加上过滤布没洗干净，就成了那个样子。后来，纠正了工作中这些粗糙、疏忽的缺点，豆腐的数量和质量便都稳定了。

最近，班长熊雨芳当了团里的磨豆腐技术集训队的教员。他既是“先生”，又是“学生”，虚心学习了兄弟单位的长处，回来后又进一步改进了自己的操作方法。现在，用同样的黄豆，每斤能磨到六斤豆腐，创造了所在部队磨豆腐的最高纪录，他可以说是比较地掌握了磨豆腐的自由了。

（原载《解放军报》1965年10月29日）



为人民站柜台，从实践中学本领

西安市综合零售公司
纺织城商店百货门市部营业员 杨瑾瑜

在营业员工作岗位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九六一年，我从高中毕业后，劳动部门介绍我去做商业工作。接到劳动部门的通知，我的心一下子凉了。我想：“这一辈子算完了。商业部门就是卖货买货，整天笑脸接待顾客，有啥出息！”我家一个亲戚，听说我要参加商业工作，赶忙来对我说：“啥事都可以干，可千万不要搞商业工作。这个工作一时不注意就要受冤枉气。”这几句话，说得我心里更加不安。当我被分配到纺织城商店百货门市部当会计时，一见算盘和厚厚的十几本账簿，密密麻麻的数字，头脑就发胀了。我整天闷闷不乐，工作不起劲，有时控制不住，就背着人暗地里哭。

这样下去哪能行？得想个办法跳出去。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是共产党员，他严肃地批评了我。这条路走不通。我回到房子里扪心自问，想起自己入团的时候，站在毛主席像前，举手宣誓说，要坚决服从党的需要，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想起领导对我无微

不至的关怀和殷切的希望，想起学校老师、同学们对我亲切的鼓励：“要使个人志愿服从祖国的需要，不要被个人兴趣所俘虏。”越想越惭愧。

党总支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引导我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两篇文章。学了以后，就觉得毛主席的许多话都是说我，正是给我画像啊！我深深感到自己过去的想法太不对了，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为人民利益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思想通了，看见算盘、数字就想起张思德、白求恩同志，不由得拿出自己全身精力做好工作。别人用三个指头打算盘，我用两个指头慢慢拨。有些营业员就在背后议论说：“高中毕业生打算盘还不如营业员，一个珠子一个珠子往上拨。”我听了，没有生气，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自己也想：“当兵的不会打枪，干会计的不会打算盘，这实在讲不通。”所以，我就虚心地向同我一道工作的老会计崔桂贤同志学习。每遇到一个问题，我都打破砂锅问到底。为了使崔桂贤同志有更多的时间教我学业务，有时我帮助她到托儿所接



孩子。有一段时间，在星期天，我也利用半天时间和弟弟一起打算盘，看谁打得准，打得快，常常打得手指发麻了才休息。为了掌握会计知识，我买了一些有关的书籍，每天早上学习一个小时。特别是对商店编印的会计须知，我坚持天天读几遍，直到背得烂熟为止。就这样，在领导上的关心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初步掌握了会计知识，能够独立工作了。

没有多久，崔桂贤同志休假了，两个人的工作由我一个人担任，工作很忙。当时看到和我一起参加会计工作的同志，都是和老会计一起工作，比较轻松，而我却整天忙得连休息、看电影的时间都没有，又胡思乱想起来。我知道这个想法不对，就赶紧向毛主席著作请教，反复读了《纪念白求恩》一文。毛主席说：“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①我读了这段话，懂得了要为人民服务，就不能遇事先替个人打算，应该时时、事事想到集体，想到人民。特别是我们年轻人，正在长知识和锻炼阶段，不主动挑重担子，哪能有所进步。后来，遇到工作忙的时候，就是加班到晚上两三点钟，我都觉得是应该的。如果当天的工作没有做完，我也睡不着。

我这个商业战线上的新兵，并没有做出多少成绩，一九六三年却被同志们评为商店会计标兵和先进工作者，后来又被团组织推选出席了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

六四年六月十一日下午三时，毛主席、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出席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和代表们一起照了相。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也是我进一步下决心踏上革命化道路的起点。当毛主席走到离我最近的地方，我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使尽全力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从我加入少先队起，就盼望着有一天能够见到敬爱的毛主席，可是当我实现了这个愿望，见到了毛主席的时候，我内心里却又感到惭愧，总觉得自己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没有什么值得向毛主席汇报的。我心里暗暗向毛主席保证：毛主席，我从今以后，不论是风里雨里，火里水里，一定跟着党，跟着您，就是牺牲生命，也要把革命的红旗高高举起。

我从北京回来以后，把自己的工作好好检查了一下。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②。自己是个从学校门出来又坐办公室的小知识分子，对商业工作，既没有感性认识，也没有理性认识，需要老老实实从取得感性认识开始，所以，我决心到第一线当营业员。经过自己申请，领导批准，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我正式到化妆组当营业员。

有一天，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娘听说我见过毛主席，就专门到商店来，走到柜台前，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5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0页。



拉起我的手，亲切地问：“你这个年轻姑娘，见了毛主席，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好吗？”我连忙回答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好，身体好。”老大娘把我看了一会，又说：“你见了毛主席，今后可要好好工作啊！”群众的亲切希望，深深感动了我。我心里暗暗地想：“老大娘，你放心，我一定要好好把营业员的工作干一辈子！”

熟悉商品，了解顾客 练好营业员工作的基本功

初站柜台，什么都不熟悉，困难很多，顾客的询问，常常答不上来。顾客问：“这牙膏是什么味道的？这香皂是什么香型的？”我只能说：“不知道。”这样一来，有些顾客就不满意地走了。自己心里怪不是个味道。我为什么做不好工作呢？反复考虑的结果，主要是因为对商品不熟悉。因此，我觉得只有努力钻研业务，才能更好地为广大消费者服务。

但是，究竟怎样钻研业务、熟悉商品呢？开始时我曾这样想：领导上如能把我送到商业学校学习一个时期，出来后再当营业员，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思想上不断翻腾，想了很久。后来想到，毛主席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①又说：“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②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我应该在商业工作的第一线学习，在实践中面对商品学习，在实践中练好基本功。

化妆组经营着五百多种商品，要想一下子都熟悉它们，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商

品虽然很多，从销售的情况来看，总有个主次之分。于是，我就先学销售量较大的牙膏、肥皂、香皂、香脂之类商品的知识，然后学销售量较小的花露水、香粉之类商品的知识。

经过学习、实践，我摸到了六种学习方法：

第一，把商品的说明书和商品包装皮剪下来，作为学习材料，进行对比学习。我收集了八十多种牙膏和香皂的包装皮和说明书。开始收集包装皮时，有些同志说：“瑾瑜就是个小孩脾气，见啥盒盒都喜欢，都往口袋里装。”当他们知道我这样做的目的后，都说做得对。

第二，接待顾客时，多征求顾客对商品的意见，向顾客学习。如顾客来买牙膏时，我就问：“您过去用哪种牙膏？是什么味道？”这样，问得多了，对一些商品的特点也就熟悉了。

第三，自己在购买本组商品时，有意识地选择不同品种，亲自实践，熟悉商品性能。

第四，碰到较难熟悉的商品，特别是新产品时，就写信向工厂请教。有一次，新到了一种扇牌透明洗衣皂，每块四角三分钱，比一般肥皂贵，比香皂便宜，有的人一买就是四、五块。但也有人提出：“既然是洗衣皂，为什么这样贵？”我自己也弄不清，就写信问工厂。工厂来信说：“这种扇牌洗衣皂是新产品，原料同香皂一样，就是香精少一些，也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4页。

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可以当香皂用。”后来碰到顾客提出疑问时，我就能主动宣传这种新产品的特点了。我先后向上海制皂厂、天津香皂厂、中国化学工业社等单位写过信，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使自己学到了不少的商品知识。

第五，向别的营业员学习。我们化妆组的几位同志各有特长。有的同志对各种商品，特别是各种牙膏，不看标签，就能一口报出价格来；有的同志陈列商品又快又好。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第六，联系实际，学习介绍商品知识的书籍。我过去看过一些这类书籍，由于没有联系实际，不会使用。例如，学过香皂有各种不同香型的知识，可是，拿出一块香皂来，却对不上号。后来，在营业中注意了对照商品来学，接待顾客时联系起来用，这样边学边用，记得牢，用得上。

一个营业员，如何才能使一种商品适应不同顾客的需要，充分发挥其效能呢？这就使我联想到牙膏与牙齿的关系和各类牙膏的适应对象。大夫看病要对症下药，难道我当营业员就不能做到这样吗？我想起了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里说的，要“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①，就决定抽个时间去口腔医院挂个号，向大夫请教。我想，见了大夫时就说：“我不是来看病的，是请你教给我一些关于牙膏与牙齿方面的知识。”但又怕人家不告诉我。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领导，开了个介绍信，请纺织城职工医院一位有经验的老大夫耐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大夫告诉我药物牙膏分两大类，一类是防锈牙膏，一类是

防蛀牙膏，各有不同的用途。以后，我就能够根据不同顾客的需要，介绍牙膏的性能了。

通过这件事，使我深刻感到：任何人只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诚心，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热情的支持和帮助。这又推动了我不断前进。

徐寅生同志在《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中说，他的技术全是从别人那里“批发”来的。我的商品知识，同样是从别人那里“批发”来的，向顾客学习的，向营业员学习的，向工厂学习的。现在回想起自己学习商品知识，从不熟悉到比较熟悉的过程，就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过程。在我不熟悉商品知识、没有掌握营业员工作规律的时候，顾客一问三不知，心里很紧张，工作很被动，感到站在柜台里很不自由。当我慢慢熟悉了业务，掌握了一些商品知识和营业员工作规律时，就有了点“自由”。顾客问什么，能随口应答，心里也不害怕了。有一次，一位顾客要买留兰香牙膏，当时我们商店正缺这种货，我就主动给他介绍和留兰香牙膏香型相同的红马牙膏，顾客满意地买了。

营业员了解商品，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顾客的需要也要作分析和了解。由于顾客的职业不同，年龄大小不同，性别不同，籍贯不同，他们的喜爱也就各有不同。营业员自己的喜爱，并不等于顾客的喜爱。如果营业员按自己的喜爱向顾客介绍商品，就可能在工作中犯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错误。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第28页。



所以，在介绍商品时，要根据不同顾客的特点，考虑到他们的不同需要。例如，我们商店供应的对象主要是纺织工人、职工家属以及郊区农民，他们各有不同的特点。在职工中，新职工和老职工的需要也不同。老职工大多数都愿意购买名牌商品和质量较好的商品。新职工，特别是女职工，在购买商品时，一般喜爱买物美价廉的，除了注意商品的质量以外，有时还特别注意商品包装的美观，如看雪花膏的瓶子是否好看，等等。针对这种情况，对顾客介绍商品时要灵活机动，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的介绍，不能一见顾客就“劈哩叭啦”介绍一大堆。不然，有时会引起顾客的反感。介绍商品也要因人、因时制宜。忙时少介绍，闲时多介绍；顾客是内行就少介绍，是外行就多介绍；顾客买货主意定了的少介绍，顾客拿不定主意的多介绍；老牌商品少介绍，新产品多介绍。营业员只有掌握了顾客买货的规律，在介绍商品时才能满足顾客的需要，缩短交易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严格要求自己 改善服务态度

熟悉商品、了解顾客需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顾客服务。党组织要求我们对待顾客要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因为营业员服务态度好，体现着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关怀；态度的冷与热，不是小事而是大事，我们要不断改善服务态度，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营业员成年累月在柜台前接待顾客，有时和顾客之间难免要发生矛盾。根据我的观察，营业员和顾客之间发生的矛盾有三种：一种是来自营业员方面的。有的营业员由于种种原因，工作时思想不集中，或者因为工作上的疏忽，对顾客提出的问题处理得不好，引起对方不满。一种是来自顾客方面的。有的顾客不照顾营业员工作的特点，对营业员提出不适当的要求，或者不顾国家利益，坚持不合理退货等等，给营业员的工作造成困难。还有一种情况是顾客和营业员双方都有缺点。

出现这些矛盾时应该怎样解决？过去总认为，营业员和顾客之间发生矛盾，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双方都有责任。学习《矛盾论》后，这种看法有了改变。我想，营业员卖货，顾客买货，营业员是为顾客服务的。只要营业员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良好的服务态度，顾客和营业员之间的矛盾，是能够得到解决的。这样，就比较清楚地看到，营业员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改善服务态度：

第一，营业员站在柜台上，要全心全意做好工作，不能在接待顾客时夹杂个人情绪。营业员一进柜台，就要时刻想到服务态度好不好，是影响到党和政府同群众的关系的大事，要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地去接待顾客。

第二，营业员和顾客之间发生了矛盾，营业员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检查自己的服务态度。

第三，遇到顾客方面有缺点，营业员要



体谅对方，耐心解释，不急不躁，使问题得到正确的处理。

进行调查研究 不断改进工作

在柜台上有时忙，有时闲，这件事有没有个规律呢？我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对于某个问题，“你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①为了认识和找到这件事的规律，一九六五年五月六日，我利用自己的休息日，专门作了一天观察和统计。这天我们营业小组共接待了八百六十多人，男女顾客比例是一百比一百八十，全天共卖二百六十元，平均每笔交易三角多。用这个平均数除一定时期的销售额，就可以估计到这个时期共接待了多少顾客。根据夏季作息时间，顾客进店最多的时候是上午八点半至十点，中午十一点至一点半，下午六点至八点半。这些情况，为我们组织货源、安排任务和排班等提供了参考。当然，这只是我学习调查的开始，今后我将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进行更多的调查，为我们主动安排好工作寻找比较科学的依据，争取把工作做得更加主动。

我们是社会主义商业的营业员，不能把自己的工作仅仅限于一手交货，一手收钱，还必须当好工厂的耳目，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尽力帮助国家掌握供、产、销方面的情况，以便解决营业中遇到的矛盾。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下旬，我详细调查了上海制皂厂生产的二十多种产品的销售情况，发现有的销售快，有的销售慢；群众反映有些香皂包装不好，有的香味不持久等等。我把这些情况和群众提出的意见，写信告诉上海制皂厂，使他们了解我们这里顾客需要商品的情况，便于安排生产，提高产品质量。

一个营业员，还必须从革命利益出发，时刻注意工作的政治方向。我们化妆组有一个时期，单纯为了降低商品零售起点，把卖二元四角一瓶的指甲油，改为搽一次一分钱。有的青年纺织女工就来搽指甲油，把指甲染得红红的。当时我想，我们社会主义商业的营业员，首先是个革命者，不能为了做生意就什么都不顾了。搽一次指甲油一分钱，问题不在于钱的多少，而在于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打扮。我们经营指甲油，主要是为了供应一些演员演戏时的需要。所以，我和同志们一起向领导建议，取消了这个办法。通过这件事，使我们认识到，站柜台决不能为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青年开方便之门。

我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每当我翻开毛主席著作学习时，总觉得好像毛主席就站在我的面前看着我。今后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学一点，用一点，坚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改造思想，做好工作，真正做一个红色的营业员。

^① 《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28页。



評吳晗同志的資產階級歷史觀

馬 岩

吳晗同志的《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能夠算作“自我批評”嗎？不能。它是对《海瑞罷官》的辯護。豈止是辯護，而且是反攻。這又一次證明了，吳晗同志是多麼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的政治觀點和學術觀點。

《海瑞罷官》這個劇本，不可等閒視之。它喊出了資產階級的心聲。它是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思潮的一種反映。

不可低估批判《海瑞罷官》的意義。圍繞着批判《海瑞罷官》展開的這場大辯論，是一場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

這場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揭露和批判吳晗同志在史學領域內堅持和宣揚的資產階級歷史觀。這種歷史觀的最根本之點，就是反對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來觀察歷史。吳晗同志對封建社會的描繪，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無不貫注着這一點。

今天，形形色色的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都在鼓吹抹煞階級矛盾、調和階級鬥爭的謬論。我國歷史學界中持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唱出同樣的調子，絕非偶然。

我們必須在歷史研究中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堅持階級鬥爭學說，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歷史觀。

封建社會的歷史是不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故意抹煞階級鬥爭，是吳晗同志資產階級歷史觀的核心。他認為，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時，地主階級是進步的力量，不能批判；秦皇、漢武、唐宗、康熙、乾隆這樣一些“全盛



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光明面”，不能批判^①。他断言：“并不是如有人所说的，一部二十四史都是人吃人的时代，应该说历史上曾经有过黑暗时代，也曾经有过光明的时代。”^②

“人吃人”，这是对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揭露。在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处于地主阶级的残酷盘剥下，或者被杀戮，或者被折磨，总是逃不脱被“吃”的命运。早在五四运动前夕，鲁迅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便在《狂人日记》中，揭穿了封建制度这种“人吃人”的本质：“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③五四运动时期，激进民主派以无畏的勇气，从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的字缝里，揭露出封建制度这种“吃人”的本质，这正是他们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承认不承认封建制度是“人吃人”的制度，反对不反对这种制度，在五四运动时期，就是判别一个人是站在革命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一边的一个重要标志。白翎从小就对“大地主不满意，对农民同情”的吴晗同志^④，竟连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反封建精神，都觉得不能容忍，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

处于上升时期的封建制度，就不是“人吃人”的制度了吗？就不能批判吗？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否认任何一种剥削制度在其上升时期的历史的进步作用，而且给了这种作用唯一科学的解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时期中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论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或是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都是以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任何一种剥削制度，不论它处在没落时期还是上升时期，都存在着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斗争。有地主，就有骂地主的农民；有封建，就有反封建的农民。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不管吴晗同志对于“一见历史上的奴隶主、封建主、资产阶级等等，就喊打倒”的人^⑤，怎样讥讽嘲笑，也改变不了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事实。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一些经济上比较繁荣的时期。可是，就在比较“繁荣”的时期，封建制度的人剥削人、“人吃人”的本质也是不变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

① 《学习集》，北京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301、267 页。

② 《灯下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0 年版，第 191 页。

③ 《鲁迅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2 页。

④ 《春天集》，作家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58 页。

⑤ 《学习集》，第 301 页。



没有因为“繁荣”而消失。恰恰相反，这种“繁荣”，正是建筑在对农民群众的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之上的，是以这种剥削和压迫为前提的。恩格斯写道：“文明的基础既是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那末它的全部发展便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领域里每前进一步，同时也就意味着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后退一步。对一个阶级的利益，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灾难”^①。吴晗同志的严重错误就在于，抹煞了封建社会“繁荣时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它说成是皇帝爱百姓、百姓爱皇帝的光明时代。

谁要指出封建社会中的“上升时期”“繁荣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吴晗同志便大肆责备，说这样就使得“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他说，在许多新编的历史教材中，“尽是这个皇朝如何坏，农民起义推翻了它，另一皇朝起来了，又如何坏，农民起义又推翻了它，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灰溜溜的。”^②原来，在吴晗同志看来，农民起义算不得历史上的光明面，岂止不光明，而且很黑暗！说农民起义如何好，同说一个个皇朝如何坏，完全一样，都是抹煞了光明，宣扬了黑暗。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完全相反，吴晗同志说的“光明面”，恰恰是黑暗面；吴晗同志说的“黑暗面”，恰恰是光明面。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③他还指出，这种“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的农民起义，正是中华民族的“光荣的革命传统”^④。

农民起义，“一片打倒声”，光明得很！农民革命势力所到之处，官府的赋税不纳了，劳役不服了，地主阶级所有制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这才是黑暗的封建社会里透露出的真正的光明。

吴晗同志为了证明封建社会的光明面，不是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而是农民同地主的阶级合作，为了替这种阶级调和论制造论据，他一方面极力夸大大地主、大官僚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他又大讲所谓中小地主同人民之间的利益一致性，说“好皇帝”“清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70页。

^② 《学习集》，第267页。

^{③④}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19、617页。



官”就是代表着中小地主和人民的利益向大地主作斗争的。他说，朱元璋“无情地打击了一部分大地主”，“朱家政权的支柱是广大的中小地主和富农。在他的官僚机构中，官员的来源主要来自这个阶层”^①；海瑞“打击了官僚地主，保护中小地主和贫农中农以及市民”^②。

说来说去，吴晗同志是用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来代替农民同地主的阶级矛盾。

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内部是存在着矛盾的，如阶层等级之间、集团派系之间、在朝与在野之间、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之间、地方势力相互之间，等等。这种矛盾，有时也会表现得很尖锐，需要动用法庭、监狱、军队来解决。而在这种冲突中，人民也往往大批地成为无辜的牺牲品。那末，究竟应该怎样来认识这种矛盾呢？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归根到底，都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利害冲突，都是地主阶级内部争夺剥削和压迫人民的权力的自相厮杀。不论这种矛盾尖锐到什么程度，地主阶级的各阶层、各集团在反对农民这个问题上总是一致的。怎么能用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来代替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呢？

毛泽东同志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③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贯串于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始终，决不会由于“上升时期”而消失，决不会由于“繁荣时期”而中断。这个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的矛盾，决不会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代替。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决不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而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农民阶级的历史，就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历史，就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历史。

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④承认还是否认文明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无产阶级历史观同资产阶级历史观的根本区别。在吴晗同志笔下，农民同地主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见了。他或者用经济繁荣的现象来掩盖农民同地主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或者用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来代替农民同地主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就证实了，他在历史研究领域内奉行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而阶级调和论就是这条路线的神经中枢。

① 《朱元璋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5 年版，第 187 页。

② 《灯下集》，第 195 页。

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9 页。

④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491 页。



封建王朝的政策是不是“超阶级”的政策

为了宣扬阶级调和论，美化封建统治阶级的政策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吴晗同志以及一些和他持有同样观点的人，大肆宣扬封建统治者曾经对农民实行过明智的“让步政策”，说什么朱元璋“能够接受历史教训，对农民作了一些让步”^①，说什么西汉初年、东汉初年、唐朝初年、明朝初年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当时统治者实行“让步政策”的结果。

这是对阶级斗争历史的歪曲。

历史上在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新王朝开始建立的时候，如西汉、东汉、唐朝、明朝等，封建统治者面临的都是经济雕敝、政治动荡的局面。地主所有制，遭到了农民革命的严重打击。在地主阶级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在地主阶级集团之间混战的过程中，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规模农民起义虽然已被镇压，但余波未平，还有农民起义军在坚持斗争，或者以隐蔽的形式在积蓄力量待机再起。地主阶级中有些集团，暂时还没有听从新王朝的统一指挥。这种时候，封建统治者总得采取种种措施，扑灭农民起义的余烬，恢复和巩固地主所有制，恢复和加强封建统治秩序。他们很明白，如果不这么办，新建立的统治大厦是不稳固的。

吴晗等同志反复渲染的所谓“让步政策”，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而是新王朝团结整个地主阶级的政策。所谓“轻徭薄赋”“免租减税”，实质上是给予各地大大小小地主的优惠。汉末的荀悦曾经说过，汉文帝时，实行减免租税的政策，是“资富强”，结果是“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②。朱元璋曾经明令规定，只是官员、退职官员、生员才享有减免徭役的权利，而其他人特别是农民则有“趋事执役以奉上”的义务，不在减免之列。^③推行这些措施，是新王朝取得整个地主阶级信赖和支持的重要原因。由于推行这些措施，地主阶级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力量，新王朝便能依靠他们加强对农民的统一统治。可见，所谓“让步政策”，其实是封建统治者调节地主阶级内部关系，统一地主阶级力

① 《朱元璋传》，第300页。

② 见《前汉纪》，卷8。

③ 《明太祖实录》，卷111。



量，共同对付农民的政策。

封建王朝只会对地主阶级施行“仁政”，决不可能对农民施行“仁政”。封建统治阶级决不会因为受到农民革命的打击，就“接受历史教训”，改变自己的阶级本性，变得对农民亲爱温柔，慈悲为怀。相反，在农民起义失败以后，封建统治阶级总是怀着刻骨的仇恨，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反攻倒算，剥夺农民在革命中取得的胜利果实。例如，东汉初年的封建统治者，对于农民起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奖赏官吏以杀人多少为标准。明朝初年，农民起义仍然连绵不绝，“官军”对起义农民的逮捕和屠杀，动辄以千万计。这种残酷的阶级报复，是大规模农民起义后建立起的一切封建王朝必然采取的措施，从无例外。这种血淋淋的阶级报复的历史事实，是那种虚构的“让步政策论”所冲刷不掉的。

不错，新的统治者对农民也实行过招抚逃亡、奖励垦荒之类的措施，但这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在加强暴力镇压的同时，玩弄的欺骗手腕罢了。他们要用这种手腕来达到用暴力手段所达不到的目的。在新王朝建立的时候，由于农民在战争中大量死亡和逃亡，许多地区严重缺乏劳动力，农田荒芜。而没有被剥削的对象，统治阶级是活不下去的，何况那些逃聚山林的农民还是对统治阶级的严重威胁。针对这种情况，统治阶级才采取那一套欺骗政策，用一些小恩小惠，把农民哄来作为供他们剥削的牛马。这些政策，并不是出于统治者的仁慈或明智，并不是什么对农民的“让步政策”，而是封建统治阶级寻找到的最适合于当时条件的统治办法。采取这种办法，对地主阶级是最有利的，既可以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又可以麻痹农民的革命意志。

每当农民起义的暴风雨过去以后，地主阶级用“恩威并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把农民重新控制和束缚了起来。由于农民战争严重地削弱了封建势力，地主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恢复元气，因此，在某些地方，农民遭受的剥削暂时可能较起义前略有不同。但是，任何时候，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都是它力所能及的最大限度的剥削。正因为如此，随着地主阶级统治力量的加强，农民遭受的剥削越来越残酷，生产遭到破坏，社会经济便又陷入严重的危机。这时候，农民便又点燃起了起义的烽火。

当地主同农民的阶级力量对比有利于地主的时候，当大规模农民起义被镇压而农民的斗争处于低潮的时候，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的是反攻倒算，尽快地消灭农民革命势力，尽可能地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决不会实行什么“让步政策”。当地主同农民的阶级力量对比不利于地主的时候，当地主阶级不能按老样子统治下去的时候，地主阶级有时也会采取一些迂回曲



折、以退为进的策略，对某些统治办法作局部的改变，欺骗和麻痹农民，力图削弱和扑灭农民革命斗争。这种策略，是地主阶级整个反革命政策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也不是什么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实行这种策略的时候，地主阶级决不会放松对农民的暴力镇压，而是用这种策略来作为对农民的暴力镇压的补充，并为更加残酷地剥削农民、更加凶恶地镇压农民革命势力准备条件。

毛泽东同志指出：“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①封建统治者对农民革命势力，应用的同样是这个原则。吴晗同志却硬说，封建统治者对农民不采取这个原则，反而实行仁慈的“让步政策”。你看，封建统治者这么厚道，农民还要反对它，还要造反，那当然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了！

吴晗同志除了宣扬地主阶级曾经对农民实行过什么“让步政策”之外，还力图证明“好皇帝”“清官”办了很多“好事”，如惩治贪污、抑制豪强、兴修水利，等等，说“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②。在吴晗同志看来，这些“办了大大的好事”的“好皇帝”“清官”，或者由于出身“贫苦”，或者由于“秉性刚阿”，或者由于“眼光远大”，虽然一方面仍旧是皇帝，是官，但同时却又奇妙地兼职作了“人民的代表”，“一身而二任焉”。总之，“好皇帝”“清官”之所以成为“好皇帝”“清官”，就是因为他们为保护农民的利益，办了“好事”。

“惩治贪污”！皇帝就是最大的贪污犯。有时皇帝也惩治几个贪官，这是因为，那些贪官贪得过多，王朝的收入就会减少，还可能闹到“官逼民反”的地步。

“抑制豪强”！皇帝就是最大的豪强。有时皇帝也抑制几个豪强，这是因为，那些豪强的行为，不利于王朝的统治，甚至会动摇皇帝的宝座。

执行王朝意志的“清官”，也反对过贪官豪强的某些“不法行为”，但是，他们并不反对地主阶级的一切“不法行为”。实际上，地主阶级的“法定权利”和“不法行为”之间不会有严格的界线，更不会根本对立的，而是可变的、相对的、相互补充的。一八九四年，恩格斯在评论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时说过：“我们可以主张使资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反对小农的斗争今后尽量少用不公正的手段进行，并且尽可能阻碍有过分常见的直接掠夺和欺诈行为发

^①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1—1182页。

^② 《春天集》，第204页。



生。这是只有在例外的场合才可作到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谁也搞不清楚何处算是诚实赚钱的终点，何处算是诈欺取财的起点。”^①在人剥削人的社会里，哪里是“诚实”剥削的“终点”，哪里是“欺诈”剥削的“起点”，是分不清的；怎样算是“合法”的剥削“权利”，怎样算是“不法”的剥削行为，同样是分不清的。今天的“不法行为”，明天会被当作法律固定下来，成为“法定权利”；今天的“法定权利”，明天也许会在法律条文中被取消，而在实际生活中却仍然保持着。“豪强”的地主和“不豪强”的地主，“法定权利”和“不法行为”，本身就很难分清。其实，封建社会的“王法”所划的“合法”和“非法”的界线，主要是为了对付农民，地主剥削农民是“合法”的，农民反抗地主是“非法”的。至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在怎样的限度内算是“合法”的，超出了怎样的限度算是“非法”的，地主阶级是不能够也不愿意划分清楚的。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清官”，又怎么能去制裁所有的贪官豪强，惩办所有的“不法行为”呢？所谓“执法如山”的“清官”，惩治几个贪官豪强，也不过是找几只替罪羊，来宣扬宣扬“王法”的“公道”、帝王的“英明”而已。

“兴修水利”！当然，这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好事也应该分析。水利，归根到底是劳动人民修的，主要应当归功于劳动人民，而不应当把功劳都记在“好皇帝”“清官”的账上。而且，“好皇帝”“清官”兴修水利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地主阶级的需要，是为了地主阶级掠夺更多的地租，是为了王朝征收更多的赋税。事实上，一切剥削阶级，从奴隶主到资产阶级，为了剥削得更多，总要采取一些促进生产发展的措施。有人会说，社会生产发展了，劳动人民不是也有好处吗？生产发展了，劳动人民不一定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剥削阶级常常把增加的社会财富全部掠夺了去。有时，劳动人民也可能得到微薄的一份。即使如此，又为什么要对统治者感恩戴德呢？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应该归剥削者享有，如果留点残羹剩饭给劳动人民，就是剥削者办了“大大的好事”！这就是吴晗同志的逻辑。

毫无疑问，封建统治阶级的不同的代表人物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他们实行的不同政策对社会生产的影响是有区别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上那些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促进生产的政策，和实行那些政策的代表人物，从来也不抹煞其历史功绩。但是，封建统治者实行的政策，决不会是为农民谋利益的政策，决不会是“超阶级”的政策，而只能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政策。执行这些政策的帝王官吏，毫无例外，都是地主阶级的阶级代表，他们的行为决不

^① 《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36页。



会违背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怎么会有那么一种人，既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又是农民的“救星”呢？

史学领域中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

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历史学界在历史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的指引下，掀起了一个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历史唯心主义的革命浪潮，掀起了一个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浪潮。历史著作和历史教材，必须打破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王朝体系，必须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已经成为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共同要求。原来被一些人当作偶像的帝王将相，文人学士，遭到了革命的批判。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出现过某些简单化的缺点，可是整个地来说，史学领域里呈现出一种敢于打破旧传统，敢于跳出前人窠臼的生气勃勃的景象。这种形势的出现，是同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分不开的。

毛泽东同志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①历史学界中革命批判精神的激越昂扬，是这场大喊大叫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这个总目标服务的。

对于史学领域内革命精神的大发扬，资产阶级认为糟得很。凭着阶级的本能，资产阶级深知保卫自己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阵地的必要，他们就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批判进行抵制和反击。

为什么对于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竟会引起资产阶级如此激烈的反对呢？为什么在史学领域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却是环绕着如何对待封建社会的历史这样一个问题展开的呢？这必须从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上来寻求答案。

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的时候，它的先进人物对封建的社会、封建的国家、封建的传统曾经作过无情的批判。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剥削阶级的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版，第706页。



意识形态，它们之间有共同的东西，有妥协的基础，因此当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时候，它需要也能够同封建的意识形态结成同盟。这种态度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例外，不过它还有自己的特性。“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抵抗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常常感到自己可以夸耀、可以迷惑人的东西未免太少了。而流传了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形态，对人们却有很深的影响。因此，在历史上，中国资产阶级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时，除了贩运外国资产阶级的一些反动学说以外，还不得不乞灵于封建的意识形态。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当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共产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对封建文化展开猛烈冲击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就挂起“尊孔复古”“东方文化”的招牌，从历史垃圾堆里拣出一些东西，作为反对革命的武器。当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推行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新生活运动”的时候，他们的御用文人又一次打出了“尊孔读经”的旗号，颂扬封建道德，攻击马克思主义。

开国以来，资产阶级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时，依然是同封建的意识形态结成联盟。一九五九年以来，他们的活动又发展到非常嚣张的程度。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利用我国所遭到的某些暂时困难，刮起了一阵反对社会主义的黑风。随着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也尖锐化了。“合二而一论”、“无差别境界论”、“中间人物论”、“有鬼无害论”等等，一时纷纷出笼，此呼彼应。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吴晗同志著文立说，不许人们批判封建制度，不许人们批判帝王将相，不许人们批判封建道德，不许人们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研究历史，以历史学家的面貌，积极参加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合唱。

不仅如此，吴晗同志还“破门而出”，写出了《海瑞罢官》那样的剧本。写这个剧本，果真像他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所说的那样，是“为古而古”、“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的吗？

我们同吴晗同志在史学领域内的这场大辩论，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科学阵地同其他阵地一样，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盘踞着不走。我们必须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的大旗，在史学领域里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



一家贫农

——访问越南通讯：《人民战争花最红》之二*

魏 巍

汽车在夜色里忽然颠簸起来。借着暗淡的月光，我看看外面，大大小小的炸弹坑愈来愈多。有的山坡也被炸瘫了，石头滚落在路面上。经验告诉我，这是敌人的轰炸重点。一问，果然前面不远就是W桥了。

“哦，W桥！”我的精神立刻为之一振，不自禁地喊出声来。我早就听说，这是一座英雄的桥。在我们来到以前，这座桥已经被少则十几架多则成百架的美国飞机轰炸了三十六次，而这座桥却仍旧巍然屹立在浓烟烈火中。并且，就在这座桥的四周，有整整四十架敌机落地焚烧，还有不少的飞贼被活活生擒。（等到写这篇记事的时候，听说那里击落的敌机，已经不是四十架而是六十架了。）

我们决定立刻下车步行，好更真切地看看它，这座英雄的桥。

沿着山间公路走了不远，就看见一带江水在朦胧的月色里发着白光。人们告诉我，这就是D江。这是被约束在黑森森的群山里的一条激水。它势如奔马一般，正好在这里穿过一个险峻的山口。W桥就横在山口上。

江水穿过黑郁郁的山口直泻平原，莽莽苍苍，正像是从群山里跃然而出的一条苍龙。

我们在桥上缓缓走去。一面察看这座桥在夜色里雄伟的姿影，一面察看两岸高耸的群山，一切都显得无比威严。听听脚下的江水，江水并不喧哗，但却隐隐传出深沉有力的涛声。听说，在战斗最激烈的两天里，这里曾击落二十八架敌机。我在想，当这些敌机冒着黑烟纷纷坠地的时候，该是多么壮观的景象！难道这是白宫的老爷们所曾料到的么？不，他们没有料到。因为在他们的眼睛里，这不过是地图上的一座普通的渡桥。他们不知道一座普通的渡桥，因为拥有英雄的人，它就变成了一座隐伏着怒火的强大堡垒，一座在烈风火雨中镇静而威严的“钓鱼台”！

围绕着这座桥，产生了多少动人心魄的故事呵！

然而，我愿意首先叙说的，却是一家贫农。也许它可以回答：为什么W桥能够在烈

* 访问越南通讯《人民战争花最红》之一：《飞机也怕民兵》，发表在《人民日报》1965年12月25日第6版。



火中昂然屹立？也许它可以回答：人民战争的花朵，在什么人的心里开得最美最红？

这是发生在五月末尾的一次战斗。由于敌机一次又一次遭到惨重的损失，这些胆怯而狡猾的飞贼们，就想出一条鬼主意：他们在轰炸时总是向海的方向俯冲；即使被打掉，也可以落在海里，等待直升飞机来救。这天，当敌机正这样俯冲轰炸W桥的时候，忽然，江中犁开一道浪花，从海上沿江而上开来了一条越南军舰。这条军舰正好对准俯冲的敌机猛烈开火，给敌机造成了致命的威胁。为了摆脱不利的处境，敌机也就向这条军舰拚命地展开攻击。又是投炸弹，又是发射火箭和导弹，顷刻间，军舰四周都是腾起的水柱。这条军舰十分镇定英勇，在奔腾的D江里忽进忽退，宛如一座威风凛凛的活动堡垒，不断地向着俯冲下来的敌机喷发着猛烈的炮火。但是后来因为军舰搁浅，中了一发火箭冒起烟来。舰上的炮手也有不少负伤。也就是在这最危急的时刻，出现了一场民兵保卫军舰的惊心动魄的搏斗。

当时，在岸上指挥民兵作战的，是一位二十一岁的姑娘。她名叫阮氏嫦，是这个区的民兵队长。（她已经是我的熟朋友了，可惜此处不能详细描写她。）她正指挥着两个民兵连同敌机战斗。她一见军舰中弹，立即一面指挥民兵射击俯冲的敌机，来掩护军舰；一面指挥男女民兵登上军舰，去救护伤员并代替负伤的炮手们。一声令下，男女民兵们，有的驾起小船向军舰猛划，有的跳在D江的

激流里向军舰奋力游去。有一个女民兵吴氏选（我在上篇文章里曾经提到她），因水急浪大，被大浪打昏了，又漂回到江岸；但她刚刚醒转来，吐了几口水，就又跳在奔腾的江水里游过去了。还有一个发电厂的电工，也游到军舰上代替负伤的电工。顷刻间，这只江面上的活动堡垒，炮火又轰鸣起来，炮筒指向天空展开更加炽热的战斗。在这同时，村子里的群众也都忙碌起来，有的忙着给民兵做饭，有的驾着小船把啤酒和椰子送上军舰。尽管弹片不断地刷刷地落到江面上，但是运送弹药、运送饮料和接救伤员的小船，仍然一只接一只地向着军舰前进。直到军舰驶出自己的防区，民兵们还在江岸上不舍地追着它，跟着它，护送着它。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人民战争的图画呵！

我所要讲的一家贫农的故事，就是在这场战斗里发生的。这个村子里有一个老贫农，名叫吴寿菊，已经六十四岁了。他有五个儿子，大儿子早已参军，下剩的四个儿子，这次全部上了军舰。弟兄四个合使一门高射炮，有的装弹，有的开炮，打得十分英勇。老人最小的儿子吴寿六——大家都亲热地叫他六儿，连续负伤两次都不下军舰，直到第三次负了重伤英勇牺牲。小六儿的两个哥哥也光荣负伤。当他们英勇奋战时，老人正在社里喂猪，听到儿子的伤亡，一步也没离开自己的岗位。直到给六儿送葬，他才去了。人们怕这位年迈的老人悲伤过度，找人搀他，而他却拒绝别人来扶。并且，在墓地的追悼会上，老人硬是没有掉下一滴眼泪。



这是怎样的一个家庭，怎样的一位老人呵！

我是多么渴望能够亲眼看一看他。到达这个地方的第三天，我们就到他家里去了。那是一个雨夜。他的老伴说，他在社里喂猪还没回来呢。我们等了一会儿，也不见回。夜已经很深了。相陪的人催我们回去。我只好带着非常遗憾的心情，在潇潇的雨声里离开了这个村庄……

没想到，过了一天，我们却意外地看到了他。

这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正坐在一户农家挥着汗雨谈话，吴寿荫和他的老伴，一人手里提着两个绿皮儿的人椰子来了。他们是顶着大大的太阳，从二十里外赶来看我们的。老人的老伴是前天雨夜我们在一盏小油灯下看见过的。她比寿荫老人小两岁，今年已经六十二了。她今天还特意换了一件比较干净的棕紫色的上衣。可是，只要看一看她裙子下一双隆起粗筋的赤脚，就可以想见她一生一世经过了多少辛劳。寿荫老人穿着抗战鞋，棕色的三婆衫已被汗水浸得褪了颜色。他留着越南老人喜爱留的平头，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却行动敏捷，精神活跃。他把两个大椰子往地上一放，就说：“那天晚上你们到我家去，我到社里喂猪去了，很对不起！”又一再说明，椰子是自家种的，不是在街上买的。说完，又接着告诉我们：那天我们刚走，飞机就来投弹。有两颗炸弹正投在离他喂猪的地方不远，可是，“都是臭的”！说过，哈哈一笑。

我们忙着给老人点烟倒茶，称赞他的儿

子所作的贡献。老人兴奋得烟也顾不上抽了，把点着的纸烟往烟灰缸上一放，就谈起他的儿子来了。他告诉我们：他的大儿子在抗法战争时就参军去了，并且“参加过奠边府战役”；他的大儿媳妇也参加了工作，对他非常孝顺；他的二儿子原来在军队上当炮手，复员回来在碾米厂当工人；他的三儿子在太原工业区当工人，最近也回来搞农业来了。说到这里，他笑了一笑：

“光我们家就有四个党员！”

“都是谁？”我笑着问。

“你看，”他伸着手指，“老大家两口儿，还有老四和我们的六儿。”

“六儿本来是团员，他牺牲那天才追认是党员的。”吴寿荫的老伴补充说，“在墓上追悼他的时候，连他的叔叔都称他是吴寿六同志。”

这时，我看见老人放在烟灰缸上的纸烟已经熄灭，连忙拿起打火机帮他点着。老人究竟有些上年纪了，由于他的话被别人打断，抽了两口烟，抬起头望望众人，问：

“我，我刚才讲到第几个了？”

“讲到第四个了。”大家笑着说。

“对，对，讲到老四了。”

他抱歉地笑了一笑。接着告诉我们，老四也在军队上当过炮手，现在是民兵连长。战斗那天，他怕社里的稻子霉了，正在社里晒稻子哩，一听飞机响，就连忙跑到江边阵地上去了。……

老人兴致勃勃地谈着，当他刚刚谈到全家最宠爱的小儿子六儿，他的老伴当众打断了他。

“还是我来说吧，”她向大家说，“有些事



儿他不知道。”

提起六儿，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非常可爱的十七岁的男孩子的面影。那天深夜，我们到他家里访问，看见屋里柱子上挂着他很大一张照片。他梳着小分头，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含着微笑，显得非常漂亮聪颖。

“他是个乖孩子。”老妈妈说，“不光全家喜欢他，全村人都喜欢他。他是村里团支部的委员，牺牲时候，好多男女青年都哭啦。……”

从老妈妈的叙说里，我们知道，六儿在七年级上就停了学，在村供销社当售货员。可是他思想开朗，他说，停几年再上学有什么要紧！供销社一部分卖百货，一部分卖烟、油。本来由两个售货员管，另一个不在时，他就跑来跑去一个人干。他还在村子里担任治安工作，敌机一来，他就拿着喇叭喊，督促大家下防空洞。飞机一走，他又跑到供销社售货。晚上还去文化补习班教书。临参加战斗那天，他正拿着喇叭喊呢，一听军舰遇险，就急忙把喇叭交给别人，说：“我要到军舰去！”还说：“你们等着看吧，我会表现出勇敢来的！”他上了军舰，哥哥们打炮，他就在旁边装弹。他还让哥哥教自己打炮。他的下巴被弹片打伤，掏出手帕包扎了一下，一边淌着血，一边坚持战斗。他的哥哥要他下去，急得他什么似的连连向哥哥作揖说：“我的好哥哥，我拜拜你们，叫我千万留在这里吧！”他打出了第二排炮弹时，敌人的弹片又打伤了他的左脚，他没有倒下，仍旧继续向敌机开火。后来，一发火箭射来，弹片打中了他的头部。他实在无法继续战斗了。可是在滚滚的烟火里，他还向哥哥们行了个举手礼，表示告别，然后才倒在甲板上……

屋里沉寂无声。我脑海里立刻又浮现出六儿可爱的面影：圆圆的孩子脸，聪颖的大眼睛露出微笑。

“他活着的时候，我是有些宠他。”沉了沉，老妈妈又回忆着说。“不过整个说这孩子也没有别的。他就是喜欢书，喜欢交朋友，出去的时候，衣服喜欢穿得整齐一些。他还特别疼爱七妹妹，每天晚上回来，都教妹妹念书。他每月的工资不算多，除了给我买烟打油，其余的都供给妹妹上学。……”

我转过脸问寿蔺老人：

“听说六儿牺牲的时候，你正在社里喂猪？”

“对，对，”老人点头说，“那天我正在社里喂猪。有人跑来说：‘吴寿蔺！你的四个孩子都上军舰了！’我说：‘他们有他们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过一时，又有人跑来找绑担架的东西，我就问：‘有人负伤了吗？’他们就告诉我，老四负伤了，六儿也负伤了。他们没有敢说六儿牺牲了。这时候，我打了一个寒噤，觉着跟平时很不一样。可是我守着猪圈，一步也没有动。我不能离开！”

“这是为什么？”有人插嘴问。

“为什么！这是我们社里的整整五十口猪呀！”老人望着大家，“我要离开，飞机来炸了，就没有人把猪栏打开，这些猪得统统炸死！”

老人神色激动，把手里的烟又往烟灰缸上一放：

“后来，又有人说：‘你的四个孩子，不是死了，就是伤了。’我想，负了伤，国家给他治疗；就是牺牲，国家也会好好安葬。我



只有仇恨美帝，如果美国飞机不来，我的儿子怎么会有的负伤有的牺牲了呢！同志呀，我给你说，这时候，我真愤怒得发抖，可是我不能哭。因为，这时候飞机走了，大家正在扬场，人很多；我要是哭了，就会影响扬场，更可能影响别人的情绪。我就吩咐家里人：统统不能哭！谁也不许哭！……”

“那天，也有不少人去安慰他。”老伴补充说。

“对，对，那天有不少人到猪圈来安慰我。”老人接着说，“我对乡亲们讲：做父母的谁不心疼孩子？六儿，也不是容易就养大的。可是，他是为祖国，为党，为人民牺牲的。他牺牲是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不能回家去，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直到当天晚上，有个姑娘来代替我喂猪，我才离开了猪圈。……”

我又问：

“听说，给六儿送葬，你还不让人搀？”

“是呀，”他点点头说，“你想，哭哭啼啼搀搀扶扶的多难看哪！我给人家讲：我知道你们搀我，这是好意；可是，你们看，我不哭，也不掉泪，我走得动，你们谁也不要来扶！”

说到这里，他指了指他的老伴：

“那天晚上，我们送葬回来，已经后半夜了。省委的同志担心我们过于悲痛，把我们接到办公室去安慰我们。我的老伴就说：‘请领导上放心。以后敌机再来，我就代替六儿去送炮弹！’我说：‘不成！你还要照顾孙子哩，再说你的身子也不太行，这个任务就交给我！’……”

当老人谈着这些的时候，我的心被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震撼着。我不禁又想起前天

晚上的那个雨夜，在奔腾的D江边上的那座茅屋。这座茅屋看来比村里其他的农舍要显得低矮。可是就在这样的茅屋里，居住着一户对革命对祖国多么忠诚而又多么坚强的家庭呵！

谈起现在的生活，老人说：

“困难是有，可是要比起从前就好得多了。我给同志说吧，八月革命前，我吴寿荫没有一寸土地，几十年，我们两口都是给地主做苦工的……”

“算啦，过去的事不要提啦！”老伴扭过脸去。

“给中国同志讲讲怕什么，”老人看了老伴一眼。“后来我又给人挑东西。来回几十公里，挣不到几个钱。就这样，日本法西斯还在路上拦住我，不让我去。钱挣不来，饿得孩子们哇哇地哭。逼得没法儿，我又去山里开荒，法国鬼子的飞机又来轰炸，一天到晚钻防空洞。等到开出荒地，粮食还没有收到手里，地主又跑来收租子了。”他激动起来，“这天地虽大，逼得我吴寿荫没有一条路可走呀！最后我不得不去……，”

“唉唉，你给同志们讲这些有什么用！”老伴立刻又打断他，而且显得有些激动了。“这些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由于老伴几次打断，老人对自己的身世也就不多说了。但是他的神色仍然十分激动，他说：

“同志，你想想，我们还愿意走回头路，再去过那样的生活吗？不，不，我们一定要打到底！”

寿荫的老伴心事重重，偏过脸坐在那里。她今天几次打断老人的谈话，可以想到，这



其中有多少辛酸事呵！虽然这些事没有细讲，我们也是可以猜到的吧。这个富饶的绿色的国土，整整被法国人压榨了八十年！在这八十年中，越南人民真正是被榨得干干的。听人说，过去由于人们吃不起咸盐，甚至流出来的汗水都不是咸的。这是多么可怕的生活！两位老人和千千万万的越南人民，就是从这样的生活里走过来的。而今，越南人民好不容易从法帝国主义铁蹄下得到了解放，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这个国家，企图重新来奴役他们。难怪一提这些，老人会那么愤激。是的，这是永远也不能再让它回来的旧生活！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能再走这样的回头路！“我们一定要打到底！”——这是寿荫老人也是全体越南人民发自内心的深处的呼声。

最后，老人站起身来，托我们一定要向毛主席、刘主席问好，感谢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坚决支持。说过以后，从手上脱下一个用敌人飞机残骸做成的银色戒指，套在我的手指上。

我们把两位老人送出门外，送到栽种着绿色的龙骨篱笆的小径上。我久久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望着他们被终年的汗水浸褪了色的衣裳，望着他们粗筋隆起的赤脚，心里不禁默默地喊着：贫农们！对革命、对祖国、对党忠诚不二的贫农们！今天，我又从你们身上，看到了这块土地上深不可测的力量，听到了这块土地上真正的心声。我深信，即使在你们的面前，横起一道红腾腾的火山，它也挡不住你们的去路呵！

两位老人已经转过小径，渐渐消失在芭蕉的绿丛里。我正待转过身来，这时候，猛然听见 W 桥方向，响起了一阵十分嘹亮悦耳的像滚雷一般的高射炮声。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欢迎工农兵和学生投稿

在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中，很多工农兵和学生写出了很好的文章。本刊准备经常选登工农兵和学生写的关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历史、文艺等方面的文章，欢迎大家投稿。

